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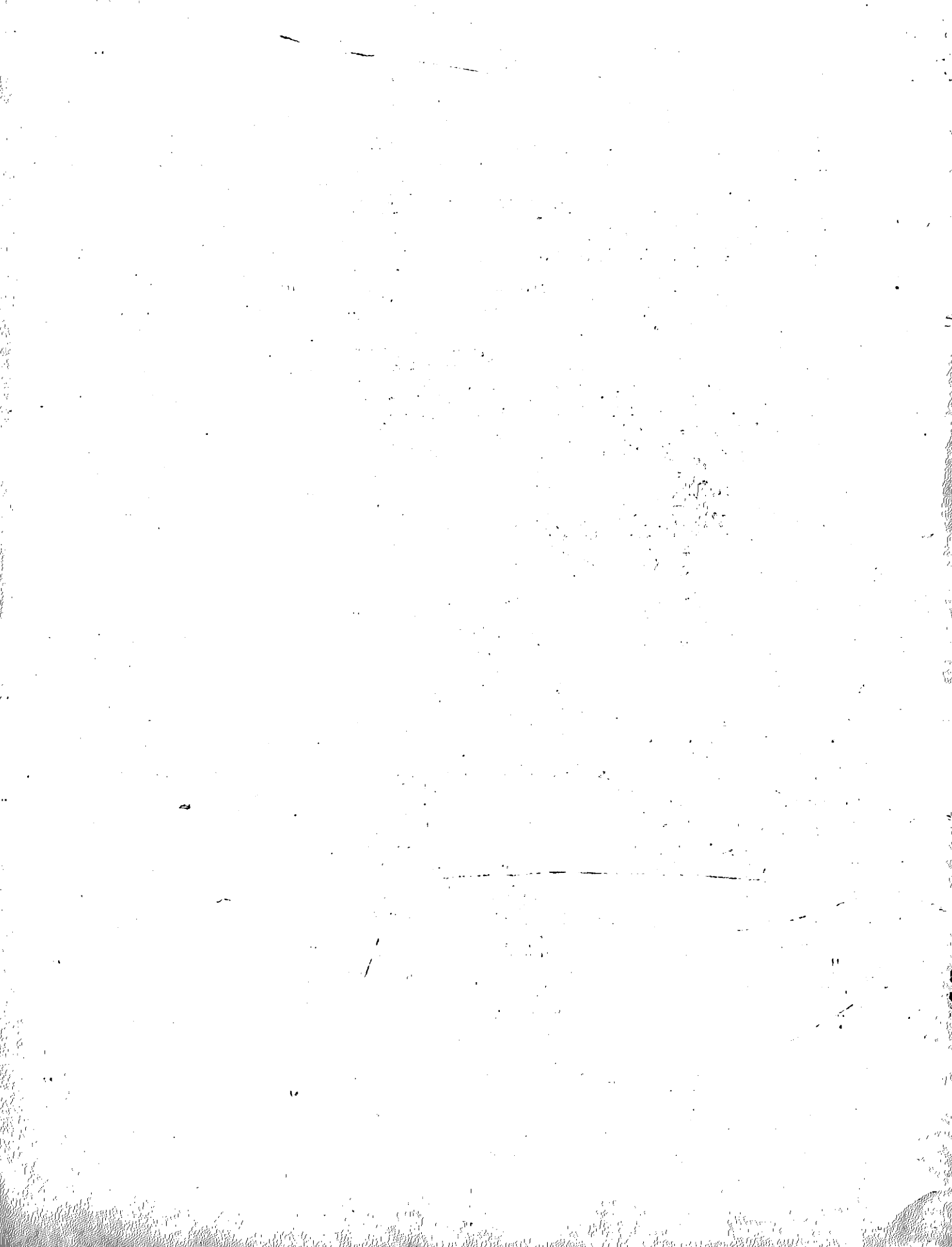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柳世泉  
七  
廿五

7

1975



# 毛主席语录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七期 目 录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 还要努力作战

- 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点体会……中共上海县委员会（3）
- 牢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任志高（9）
- 在理论学习中促进安定团结……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党委书记 干忍安（13）
- 商品自述(续完)……景池（15）
- 小评论：为谁辛苦为谁忙……新新机器厂 郑世瑶（28）

##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 学习《论联合政府》的一点体会……谷 珊（30）

发扬延安精神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上海前哨农场青年工人 韩天宇 (33)
	一份鼓舞人的个人计划	江南造船厂青年工人 黄永林 (35)
	八路军的“样子”	上无十六厂青年工人 陈传宏 (36)
	延安干部的品格	上海机械施工公司 吕长生 (38)

### 光明的一生

——记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	史 锋 (41)
赞“穷棒子”精神	第二机床厂工人写作组 (51)
做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评《杜鹃山》中雷刚的一枪	君 葳 (53)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范中柳 (55)
“礼多人不怪”吗?	文 波 (56)
也谈“份内、份外”	唐戩国 (57)

##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 创造奇迹的人们

——记金山工地的日日夜夜	金盛曦 (58)
新泾一年	本刊通讯员、记者 (68)

##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 办好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

..... 中共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委员会 (74)

### 努力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

..... 中共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委员会 (80)

## 社 会 调 查

### 他们是怎样当好生产参谋的?

——对一个单位坚持调查的调查 ..... 章智明 王之璋 (85)

### 赣南纪行

..... 吴文虎 曹 溶 (90)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 还要努力作战

——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点体会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

自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马克思主义文献发表以来，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周年了。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二十年来，我国五亿农民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使贫穷落后的旧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拿我们上海县来说，全县在一九七四年的农村总人口为三十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三人，而当年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经济的总收入已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四十五万元。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九五八年刚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全县公社一级经济的总产值是九百九十二万元。到了一九七四年，全县公社一级经济的总收入达到了七千九百四十四万元。十七年间，猛增了七倍之多。这种集体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广大农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只有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才是唯一的一条金光大道。

我县在这条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变更旧的生产关系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我县在解放后不久实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这是生产关系的一次大变动。然而，尽管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水平比土改前有了提高，但这种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就象“草上露水瓦上霜”那样，分散落后，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不到五百斤，棉花平均亩产只有二十斤，油菜籽亩产八十斤上下。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县广大农民从分散经营、集体劳动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劳分红”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劳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使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一九五六年，全县尽管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依靠了高级社的力量，和单干相比，粮食平均亩产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棉花平均亩产增长近二倍，全年的总收入仍然高于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

但是，高级社的组织规模和经营范围还比较小，集体化的程度也还不高，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存在着矛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生产关系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拿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较，全县的粮食平均亩产增长了百分之十六，为单干时的二倍多；棉花平均亩产增长近一倍，为单干时的四点五倍；油菜籽平均亩产为单干时的一点五倍以上。这些辉煌的成绩，充分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这样，就进一步调整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生产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跃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县粮食亩产翻纲要，一九七四年又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比合作化时期增长一倍多，为单干时的三倍半；棉花平均亩产一百十九斤，比合作化时增长一倍以上，为单干时的六倍；蔬菜平均亩产一百十担，比合作化时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为单干时的一点五倍；生猪出售二十七万头，比合作化时期增长三点四倍，相当于单干时的一百倍。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集体经济更加壮大，农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一九七四年全县按人口的平均收入,比合作化时增长一倍多,全县农村存款突破一亿元。以七一公社号上大队为例,这个大队的号上村原有十七户贫农,土改后的第二年仍有九户是困难户。高级社时期,其中八户经济情况都有明显好转,但还不富裕。到了一九七四年,八户中有七户上升为富裕户。同时,全大队已做到了没有一户透支户。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林彪一伙炮制的“农民缺吃少穿”的谎言,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这种变革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就需要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缺陷”和“弊病”,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目前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和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它有力地促进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以我们县三级经济总收入的情况看,一九七四年比一九六二年增长了二点六倍,换句话说,现在我县的三级经济总收入比一九六二年三个半上海县的三级经济总收入还要多。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当生产规模进一步发展后,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在集体经济内部三级所有制之间、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与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以及反映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都还存在着矛盾和不适应的状况。如果不加以解决或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侵蚀以至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影响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短期内还不能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因此,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例如,我县绝大多数社、队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的。但是,也有少数社队存在着重钱轻粮、以副挤农的倾向。在一些蔬菜地区存在着“看价种植”、“看价上市”的情况。还有某些社队企业,不是面

向农村为农服务，而是片面追求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在分配上，个别社、队采取了高工分、高福利、高补贴的不合理做法。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监督和限制，就会破坏国家计划，腐蚀群众思想，损害集体经济，削弱工农联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我们认识到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就要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干部和社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观念，全面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既要把粮食抓紧，也要把棉花抓紧，贯彻菜区“以菜为主”，粮菜夹种地区“保菜增粮”的原则。同时，尽力抓好养猪、水产、家禽饲养等副业生产，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副食品。在这方面，我县的新泾公社党委的社、队企业创造了坚持“三把关”的经验，即：把好方向关，坚持为农业服务；把好福利关，不搞高工分、高福利、高补贴；把好劳力关，适当控制企业人员，保证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等等。总之，我们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慎重地处理好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各种矛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公社三级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七四年与一九七〇年相比，公社一级总收入增长二倍多，大队一级增长近四倍，生产队一级增长百分之十七。但是，从我县经济收入的情况来分析，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九；大队一级占百分之十七·二；生产队一级占百分之五十·九。公社和大队二级的收入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一半，特别是大队一级的经济还比较薄弱。就贫富差别而言，一九七四年，按人口平均收入最高的公社比最低的公社高百分之六十五；最高的大队比最低的大队高一点三倍；最高的生产队比最低的生产队高二点七倍。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集体经济内部发展上的不平衡和贫富差别的存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生产队一级的经济。但是，为了促进生产队之间平衡发展，应当在发展生产队经济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适当地发展大队、公社二级经济。特别是那些生产队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较厚的大队和公社，更需要及时抓紧大队、公社二级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当社、队二级经济发展壮大以后，就有条件和力量帮助穷队改变“水干船头掉不转”的局面。

这里有一个公社、大队怎样支援穷队的问题。这种对穷队的支援，不能够搞贫富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也不能用金钱或物资对穷队进行无价调拨以直



接提高社员的分配水平，那样做会造成穷队的依赖思想。公社、大队对穷队的支援，表现在用社、队集体经济的力量，帮助穷队改善生产条件，如开河、修路、架桥等，使穷队能更好地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我县的马桥公社，最近几年以十几万元的巨款为地势低洼的五个大队建造了两座排涝泵站，开拓了河道，修建了公路，使这几个大队不怕旱涝，车船畅通，生产条件一改善，农业产量就能较快地增长。虹桥公社虹四大队第五生产队有二十亩低洼田和高亢地，因队小力薄，不能改造，蔬菜亩产比邻近的高产队要低四十担，后来大队帮助这个队战高亢、填低洼，蔬菜生产也就逐步赶上了高产队。同时，对某些穷队本身来说，要教育他们不指望依赖别人的支援，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把农业搞上去，使落后转变成先进。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里，还保留着少量的个体经济。就我县范围来看，这部分经济包括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禽家畜饲养、手工编结等）和搞手工业单干的五匠。对于这种私有经济，如果处理得当，引导得力，在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可以起到改善社员生活、活跃农村集市贸易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但是，如果对这种私有经济不加限制或处理不当，由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存在，又会起着腐蚀群众思想，冲击集体经济的消极作用，成为滋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和土壤。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一方面对于这种私有经济必须限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将那些合乎政策规定的私有经济任意取消。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主要应当是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引导，严格管理。只要社会主义的正气抬了头，资本主义歪风也就失去了市场。可是，我们的某些同志就是不相信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威力，对于那些政策上允许而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问题，要就干脆撒手不管，要就来个一律取缔，这是头脑中缺乏辩证法的缘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分清两类矛盾，在坚持教育的同时，按照党的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加强对私有经济的监督管理，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农村人民公社也要从方便群众出发，组织下乡服务队，设立农村手工业修理网点等形式，堵塞一切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漏洞。七一公社号上大队，从“四清”运动以来，就将单干的五匠组织起来，既方便了群众，增加了社会产品，也改造了个体小生产者，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由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暴露了上层建筑

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大大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我县的情况来看，目前全县已拥有大中小型农业机械共计五万多台(件)，百分之九十三的耕地实现了机耕，机电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但是，在机械的操作、维修保养，以及优良品种培育和科学种田等方面，却远远跟不上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机件损坏，“铁牛”只好趴在仓库里睡大觉。有的机器坏了，拖到县里去修，一等就是几天，影响农业生产。因此，贫下中农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力更生地培养“土技工”。现在有的社、队同国营工厂挂钩，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技术人材；有的公社农机厂、拖拉机站举办短期训练班，以及巡回辅导等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技术力量；还有的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机手，做到会驾驶、会修理、会保养。这些都是自力更生地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培养农村技术队伍的好方法，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应该坚持和推广。但是，也有不少社、队领导对不断调整 and 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识不足，不善于抓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思想右倾保守，向上伸手，依赖外援。这种状况是在今后要努力改变的。根据我县的实践经验，要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一方面，固然要求我们坚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同时，也还需要上层建筑和各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各种矛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在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农村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化的战斗堡垒。从我县的情况来看，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认真努力地去实现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十年前，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在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斗争中，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牢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任 志 高

一百多年以前，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刚刚在欧洲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豪迈地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一百多年来，全世界的无产者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是，无产阶级对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充分认识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最初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虽然他们身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但却不知道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自己贫困的原因，而把贫困归咎于机器的采用和个别工厂主的奴役。这时的无产阶级处在自在的阶段，还不能了解自己整个阶级的历史任务。初期的工人斗争，往往是自发地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本家作斗争，不能把资本家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而斗争的形式，也直接表现为焚烧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主等原始的斗争形式。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扩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阶级的竞争和剥削，把所有的工人都抛到了饥饿线上。工人们开始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斗争。十八世纪末，在英国等西欧国家相继出现了工会组织，并且开展了罢工形式的经济斗争。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爆发了两次起义，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英国工人开展了宪章运动，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工人举行起义。这几次起义，标志着工人阶级已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自觉程度已大大提高了一步。但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人阶级还不能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掌握革命发展的未来，因而这时的工人运动还是带有自发的性质。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总结了无产阶级长期斗

争的经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用以教育和武装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无产阶级才真正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觉地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工人阶级只有在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完成这个使命自觉地进行斗争。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阶级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的一个标志。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联合其他革命阶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得了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但是,这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革命转变的开始,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并通过这种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代所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一个具体的工人来说,只有当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出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整个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单个的工人是不可能自发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这种阶级意识,正如列宁指出的,“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由于所直接感受的只是个别资本家对他的剥削和压迫,所能产生的也只是自己和个别资本家之间对立的意识,而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认识到自己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即站在两个阶级对立的高度来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结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才产生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然后再把这种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使工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而自觉地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斗争。同样,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这种阶级意

识也不能自发地产生。因此,人们常说: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能代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只有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自觉地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列宁曾经指出:“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最容易接受和领会社会主义的思想。但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要久远得多,而且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还拥有比无产阶级多得多的传播工具,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个阶级还在,这些人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各个方面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反映这种法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对于工人队伍中的每个同志来说,要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包围,用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人阶级内部来,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另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工人队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拿上海的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等部门来说,一九四九年这几个部门的工人总数约六十二万人,到一九七四年已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人。工人队伍的发展,显示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但是,另一方面工人队伍中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级成份的比例也在增加。以造船工业中的一个船厂为例,解放初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的成份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到一九七四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其他各种成份(主要是转入工人队伍的个体劳动者)增加到百分之十八左右,青年工人占百分之五十。造船工业还是上海历史比较悠久的工业,其他如仪表、机床、手工、轻工等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的比例就还要高一些。这就

说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工人队伍的状况也在变化。它一方面为工人阶级不断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我们工人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努力去掉身上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包括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并在斗争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要完成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自己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增强党的观念,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曾经讲过:“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天,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最后的斗争。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为实现人类这个最高理想而奋斗吧。鲜红的太阳必将把全球照遍!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 小 启

本刊这一期因为稿挤,《鲁迅传》和《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两篇连载文章,均暂停一期,下一期继续登载。

# 在理论学习中促进安定团结

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党委书记 千忍安

怎样促进安定团结？它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存在着什么联系？我在这里想谈一点体会。

我们厂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职工队伍不大团结，在一些车间和部门中，大家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去，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冷冷清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全厂职工迫切希望在党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最近，我厂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后，进一步认识到了搞好安定团结是直接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从而主动解决了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团结问题。他们讲：“安定团结搞得好，社会主义江山保得牢。”所有这些，对我教育很大。广大职工要求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这是主流。只要我们在理论学习中，逐步引导大家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会更加自觉地去维护安定团结，积极地去促进安定团结。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职工队伍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我们厂就有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坏家伙，他以“请客吃饭”等手段，拉拢一批干部和群众，竭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他的活动分裂了职工队伍，搞得车间里乌烟瘴气，“一班人”变“二班人”。我们在理论学习中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揭露了这个坏家伙的罪行，对他的罪行狠狠进行批判。同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现实的阶级斗争事例，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这样，就使大家看到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危害安定团结的歪风；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势必要煽动“资产”风，分裂职工队伍，破坏安定团结。因此，我们要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就必须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并同那些刮“资产”风的人作坚决的斗争。

职工队伍中少数同志身上的资产阶级派性，也是影响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在我们厂里，广大群众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几年来的实践锻炼，资产阶级派性已经没有多大的

市场了。但在个别车间和个人的身上，却也还存在着那种不讲党的原则、只讲派别利益，不搞五湖四海、只搞“搭得够”的小圈子等情况。为此，我们在理论学习中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教育。这使大家进一步懂得，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被资产阶级派性的“巴掌山”遮住了双眼，实际上就成了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的人。我们厂有两个同志，过去闹资产阶级派性，是全厂有名的两门“横炮”，最近在理论学习中提高了觉悟，认清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性，彼此消除了隔阂，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资产阶级派性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决不可因为它可能出来干扰，就不敢抓理论学习和阶级斗争。只要我们出于公心，多做思想工作，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消极因素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要在理论学习中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还要解决不断增强党委“一班人”团结的问题。斗争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团结的能否日益实现，往往和“班长”是否善于正确处理自己和各个委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分不开的。否则，“一班人”的动作不整齐，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会受到削弱，就休想带领几千人朝着同一个革命目标去工作、去战斗。拿我自己来说，曾经一度把处理好和各个委员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有时草率从事，讨论问题和作决定时没有能充分征求和尊重各委员的意见，甚至干脆是“班长说了算”；有时则害怕矛盾，回避矛盾，听任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任意发展，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影响了“一班人”的团结，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失。通过理论学习，我认识到了这主要是由于我头脑里没有肃清“书记高人一等”的资产阶级等级观念。因此，我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重温了革命导师关于必须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教导，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在党委内部注意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样，党委会的十多个人，就好象拧成的一股绳那样，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一起克服，有力地促进了全厂安定团结形势的发展。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越是发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越是高涨，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也就能不失时机地促上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我们厂职工队伍的团结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落实，全厂开始形成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大干快上社会主义”的热潮。今年上半年，全厂完成的总产值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我厂的主要产品——港口大型门吊的生产任务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五倍半。我们决心再接再厉，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同那些破坏和影响安定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想全局，顾大局，多造港机送海港，为世界革命献力量”。



# 商品自述(续完)

景池

##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宣告了我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一伟大转折的标志，就是劳动力庄严地宣告退出了我们的家族。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除了套在头颈上的锁链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受尽了人世的苦难，饱尝了天下的酸辛。是光辉灿烂的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他们的历史航程；是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着他们的伟大斗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以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拿起了武器，砸碎了锁链，打倒了资产阶级，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造了新的世界。拿中国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一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按照我们家族的基本原则：自己不能卖给自己。因此，劳动力之退出我们的家族，确乎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的。

劳动力的离开我们家族，犹如巨雷劈顶，对我和我家族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记得在我们家族中还没有劳动力这个成员的时候，我们家族的发展十分缓慢，千百年间变化不大。劳动力一参加我们家族，就象给我们家族这只远洋航船装上了蒸汽机一样，使我们家族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动力，真是“赫赫扬扬”、“烈烈轰轰”。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终于同我们家族决裂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他的离去，不仅使我们家族少了一个成员，而且在他的带领下，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也一个个同我不告而别，扬长而去。面对此情此景，我只得望洋兴叹，徒唤奈何。如果说，在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交，是我生命史上的一次巨大转折，使我爬上了生命的顶峰；那么，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就是我生命史上一次更大的转折了。这一次的转折，使我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 似曾相识燕归来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可是，这还不是我生命的尽头。在社会主义社会，我还肩负着应有的历史使命。我还有一段相当长的生命旅程。

读者可能会问我，你的存在不是同人世间存在着无数不同所有者的事实紧密联系的吗？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你还有什么历史使命需要去完成呢？那末，我倒要反问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所有者了吗？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不同的所有者。对，我想起了今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上面登了上海市金山县八二大队党支部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列举了几个有趣的数字，很可以借来说明这个问题。文章说，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按每亩粮田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大队为四百二十五斤，八二大队是四百二十三斤。社员分配：大寨大队的全年劳动日值，七年来都是一元五角，八二大队最高时为一元三角七分，一九七三年只有一元零六分。

文章中讲的“商品粮”，就是我们家族的成员。它分别属于大寨大队所有和八二大队各个生产队集体所有，不属于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的企业、其他集体所有的企业，要得到这两个大队集体所有的“商品粮”，就要拿出自己的商品，按照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同样道理，这两个大队要取得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化肥、机织布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必须拿自己的商品按照等价的原则去交换。这样的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关系，每天都在发生。为什么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要我出场呢？原因就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全国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某一个集体所有。它们之间还有“你”、“我”的分别，它们还是不同的所有者。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不同的所有者都不是私有者罢了。于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我肩负起必要的历史使命，我也就获得了新的活动场所。不过，怎样适应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对我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已不能完全照老皇历办事了。但这是后话，暂且表过不提。

回头再说八二大队那篇文章。文章不是说，大寨和八二两个大队的全年劳动日值不一样吗？所以不一样，是因为这两个大队虽然都是集体所有制，但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又分别属于这两个大队及其生产队各自所有。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所有者。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原来的个体劳动者按照一定的范围自愿地组织起来的。它那里的基本生产资料已由原来一家一户私有，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中国原来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这种集体所有制形式，就是过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在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每个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都是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彼此需要对方的产品，只有通过等价交换。因

此,我的活动空间也是相当广泛的。

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除了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者以外,同不同所有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分工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搞工业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搞农业生产。有这样的社会分工,就决定了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不可能自给自足,而是彼此都需要对方的产品。有不同的所有者,又决定了彼此需要对方的产品只能是商品。因为商品就是不同所有者生产出来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的产品。

那末,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是同一个所有者——“全民”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相互需要对方的产品,比方说,炼钢厂需要煤矿的煤,需要炼铁厂的生铁;煤矿需要炼钢厂的钢,需要机床厂的机床;机床厂也需要钢,需要电力……。这些企业之间应该可以随便拿来拿去了吧!这些企业之间的产品,应该不是商品,我也应该从这个领域退走了吧?这个问题,在你们之间是有争论的。其实,我只要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话,也就可以说明。马克思在研究我的诞生过程时说过:“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〇六页)这个道理,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有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要同集体所有制企业交换,这种产品是商品。这样一来,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交换,产品也就成为商品了。各位读者,由于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还较短,阅历很浅,对这种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商品,难以用几句话说明清楚,这是要请你们谅解的。但是,你们如果记住下面一条,大致也可以了然。这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交换的产品,还是有两重身份,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只要保留这两重身份,不还是我又是什呢?

至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自留地上的农产品和家庭副业的产品,仍然是社员私有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除了社员自己消费的以外,拿到市场上出卖的那一部分,当然还是商品,自不待言。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家族的全体成员在两种所有制之间、在一种所有制的每个单位之间川流不息地奔驰:国营工业生产的拖拉机、化肥和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奔赴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川流不息地流向城市,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巩固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

再说,就是各位读者,每天也仍然要同我打交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你们从分配中得到的工资还是货币;公社社员从工分收入中也要分得一部分货币(另一部分是实物)。这个货币,仍是我们家族的“骄子”。你们拿了货币到商店去选购生活必需品,这也是一种商品交换。

这些就是我在社会主义社会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我在有生之余年,对人类还能够作这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就不虚度此生了。

其实,对于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问题,人们天天在讨论着。就我所知,人们还多次展开过关于我的命运的大辩论。

## 是“取消”还是“永恒”？

对于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问题发生争论，这原是不奇怪的。人们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嘛！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因而关于我的命运问题的争论，又总是同阶级斗争联结在一起。这却是值得注意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左思右想，归纳起来，对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问题上，主要有两大反动流派。一派可以叫做“取消”派，一派可以叫做“永恒”派。

这场争论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一九二〇年以前，年青的苏维埃政权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白匪的叛乱，曾经实行过对工业进行监督、对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把我们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集中起来，由苏维埃政权统一调拨，供应军队、城市和农村。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在当时，我的活动确实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一九二〇年，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白匪的叛乱，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在这个时候，在苏联爆发了一场关于我命运的激烈争论。

争论中出现的“取消”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托洛茨基提出了“把螺丝钉拧紧一下”的口号，主张国家把所有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品都掌握起来，进行直接分配，把我“取消”。他的理由是，我就是资本主义，消灭我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对此，我既委屈又发慌。委屈的是，我固然孵化出资本主义，但我本人还不是资本主义啊！说我就是资本主义，消灭我就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对我的无知和歪曲。发慌的是，果真这样的话，我岂不就此完蛋了吗？但是，我静下来仔细一想，倒觉得没有什么可惊可怕的了。因为，当时的苏联，除了大工厂生产我以外，农村中的个体农民、城市中的手工业者都还在照样为我的出生而东奔西走。如果托洛茨基真要卡死我的话，这些人就会秘密地带领我们家族的各个成员到处乱窜，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这样一来，正常渠道遭到了堵塞，工人就会得不到粮食，农民就会得不到工业品，工农联盟就会破裂，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因此，违反我的生存规律强制地消灭我，不但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提出“取消”我的真正意图也就是在这里。

在争论中出现的“永恒”派，以布哈林为代表。他主张给我绝对的“自由”，让我永世长存。他不仅主张我在国内可以自由来往，而且要取消苏维埃的“对外贸易垄断制”，主张我自由进出国境。为此，他公开反对在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中写上关于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等条文。布哈林主张给我无限“自由”，固然符合我的本性，但他其实是个睁眼瞎子，因为人类历史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我已处在那下世光景的时候，硬要恢复我的青春，完全是在逆潮流而动。

当时苏联的这两个反动流派，受到了列宁的严正批判。列宁的批判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把我们家族中的不少成员控制起来，由国家直接分配是必要的。没有这个措施，战争就不能胜利。在战争胜利以后，

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商品联系。工人阶级要取得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只能用工业品去交换。这种商品交换的方式，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因此，决不能马上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当然，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已不能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地不受限制了。而且，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等到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以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最终将要消亡，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下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会孵化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如果不加限制，那就会大批地孵化出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当时在苏联的这场争论，基本上对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定了性。这对我来说，倒也符合实际，说不上有什么怨言。但是，那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却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企图替我翻案。当然，他们与其说是替我翻案，倒不如说是打着我的招牌，替他们自己翻案罢了。话分两头。且说中国人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徒子徒孙如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类，又拾起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牙慧，一会儿叫嚷要“取消”我，“取消”由于我的存在而必然存在的价值规律，“取消”我们家族的“骄子”——货币，大刮其“共产”风，破坏工农联盟；一会儿又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大刮其“资产”风，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都是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伙叛徒、卖国贼在关于我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取消”派、“永恒”派两种反动流派兼而有之，一身而二任焉。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些家伙的反动鼓噪，只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罢了。

自然，话得说回来，对于我在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孵化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在你们革命队伍中间，也往往有人认识不清，因而放松了对我进行必要的限制。这就有变修的危险。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就是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出来的“新”毒草。他们的上台，同苏联人民过去经验不够，对我的本性认识不清，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加强限制也有关系。现在，苏联社会早已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勃列日涅夫一伙尽管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已完全替我翻了案。有一个苏修精神贵族对我作了一个新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商品生产者的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可以称之为商品生产上的“三不”主义。这当然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完全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

## 难移的本性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言之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如果本性已变，我也就不成其为我了。在我漫长的历史中，尽管人间几度沧桑，我还是依然故我，本性丝毫没有改变。

我的本性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我的两重身份：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统一。这种本性，我在自述的开头就已作了交代。且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了，社会生产的目的也相应发生了变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是为了满足整个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换句政治经济学的話說，就是社会生产已不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追求我的价值而生产，而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了。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但是，我既然存在，就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价值。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我的两重身份：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依然存在。正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才形成了我的生命。但是，矛盾也就从这里发生了。

读者中有很多是城市居民，你们吃的粮食主要是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出来的，叫做商品粮。商品粮对于人民公社本身来说，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只有价值，因为人民公社并不把它直接消费掉，而是将它卖给国家，取得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回他们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其它商品。因此，对于人民公社来说，生产粮食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且这是主导的、基本的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拿来交换，实现粮食的价值。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是这样的情况。生产拖拉机的工厂不是为了自己使用拖拉机，而是为了将它供应给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国营企业将拖拉机卖给人民公社，也同人民公社将粮食卖给国家一样，是为了实现拖拉机的价值。至于供应给国营农场的拖拉机，也要计价，使拖拉机的价值得到实现。如果生产的商品按照价值卖出去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获得了使用价值；对于生产者来说，则是实现了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如果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不能获得使用价值，对于生产者来说，则不能实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展开了。如果生产的商品高于价值卖出去，对买者来说，则表示要付出较多的货币，这就意味着吃亏；而对于卖者来说，则意味着占了便宜。相反，如果生产的商品低于价值卖出去，对买者来说，则表示只要付出较少的货币，这就意味着占了便宜；而对于卖者来说，则意味着吃了亏。你们看，由于我具有两重身份，所引起的矛盾可多哩。

我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就叫做价格。商品出现低于价值或者高于价值的情况，就表现为价格和价值发生了背离。这种背离，会使花同样的劳动生产我的不同单位获得不同的收入。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这样，就会促使一些人热衷于生产那些花费较少劳动而又能带来较多收入的商品。刘少奇、林彪炮制的“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在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条路线由于具有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经济基础，它反过来又成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工具，被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所接受，并欺骗那些思想糊涂的人。有些人在领导和组织企业生产时，根本不把我的使用价值放在眼睛里，搞什么“产值挂帅”。这“产值挂帅”也就是利润挂帅的变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管国家和人民是否需要，看到什么有利就生产什么，“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我们家族中一些产值高、利润大的成员

得宠起来，它们增加、增加、再增加！相反，我家族中一些产值低、利润小的成员就要受到冷遇，压低、压低、再压低！而事实上这种受到冷遇的成员却往往是人们所经常需要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目的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他们的目的是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只知道赚钱发财。他们象红头苍蝇一样，哪里可赚钱就往那里钻。为了赚钱，什么人间的丑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结果，尽管生产了大量的商品，但是由于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这些商品只好耽搁在仓库里。这就使得我身上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陷入毁灭的恐怖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调节下，一旦发现我家族某一类成员生产超过了需要，就会通过国家计划，减少这类成员的生产；一旦发现某些成员的生产不敷社会需要，就会通过国家计划，增加生产。这样，尽管我身上有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由于主要受到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调节，也不至于发生对抗。但是，如果对我来个“利润挂帅”或者“产值挂帅”，那就会使我身上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激化，甚至会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变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当代的苏联，就完成了这个复辟的过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炮制了以追求利润（也就是我的价值的转化形态）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他们“唯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结果呢？只要能赚到钱，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玩意儿全出来了。特别是苏修觉得军火最能赚钱，他们就大量生产军火，拿到国际军火市场上卖高价。这样一来，民用产品，特别是日用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就严重缺货，弄得我家族的许多成员在苏联不能出生，有些成员即使出生了，也是“傻”、“大”、“粗”，甚至天生就缺胳膊断腿。于是，苏联就出现了一个由所谓“低声说话的人”组成的行业。这些人站在商店门口，低声向顾客表示可以提供柜台上缺档的商品，条件是得给他们佣金。这伙投机商神通广大，只要打一个手势，使一个眼色，就能把那些缺档商品从各种柜台背后挖出来，卖出去，于是大把的卢布就到手了。飞机成了他们的专机，火车成了他们的专车，至于汽车被用来长途贩运商品，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家伙就是一伙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宠儿，是苏修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之有今日，同我的本性未改有密切的关系。苏修今天要替我翻案，在我这把老骨头的脸上搽胭脂抹粉，目的是为了欺世盗名，维护自己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这一点可是同我本人不相干了。

### “金钱没有臭味”？

近二千年前，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韦斯帕西安的，有一天忽然异想天开，下令征收厕所税，连对老百姓的拉屎拉尿也想从中捞它一把。他儿子感到用这种名目征税未免太臭了，劝他不要这样做。哪知这个皇帝反而把他儿子训斥了一顿，说：“怕什么，金钱又没有臭味。”从此，这个皇帝的这句“没有臭味”的话，就成了一切剥削阶级采取卑鄙无耻的手段去捞取金钱的信条。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沟通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同我们家族其他成员一样,都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本性也并没有改变。我的价值身份天然有一种诱人的魅力,货币就表现了我的价值。因此,货币对人们的迷惑力就更大了。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广大劳动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货币要诱惑他们也就相当困难。且说一九七四年在北京崇文门第二旅馆发生的事情:在这一年,旅馆服务员同志发现旅客遗落的手表有二十八块,人民币有一千一百八十七元。他们毫不动心,把手表和人民币全部交给公家,寻找失主。这种拾金不昧的事情,在你们社会主义中国,简直是举不胜举。自然,在你们这个偌大的国家里,既然存在资产阶级,那些货币拜物教的老教徒就一定要利用货币仍然存在的条件,继续去发展新教徒。“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上海有个不法资本家王康年,就曾经利用货币把八十几个干部拖进了资产阶级的泥坑。至于货币拜物教的最狂热的信徒,要算林彪一类反动人物了。林彪曾经赤裸裸地说:“世界上唯一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看,这个家伙真是钱迷心窍到了极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有句口头禅,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吃不开了。但是,由于有货币就可以占有商品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刘少奇、林彪他们就把这句口头禅加以改头换面,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说什么“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这个“物质刺激”我心里最明白,就是货币刺激、商品刺激,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翻版。在林彪一类蛊惑下,确有一些人中毒较深,竭力散布什么“有钱路路通,无钱全落空”,“脚板朝前长,钞票人人想”之类的言论,想尽办法占有我们家族的成员,尤其是货币。有些人甚至说什么“物质刺激”是臭豆腐,闻闻虽臭,吃吃很香。至于当代的苏联,早已成了魔鬼的天堂,人间的地狱。勃列日涅夫就公开鼓吹“卢布是火车头”,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哲学,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只能沉沦在茫茫的苦海之中,叫天不应,唤地不灵,也够惨绝人寰的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有了货币,可以购买到一切能够购买的东西。有些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上是禁止出卖的,但是有了货币,通过非法手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买到。比如说劳动力,这该是禁止买卖的吧;而且,广大劳动人民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总会有一些劳动人民生活相对困难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占有大量货币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眼红、心动、手痒了。劳动力!这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剩余价值,也就是带来财富的源泉啊!因此,只要货币存在,人们之间的平等就只能是口头上的,凡是持有货币的人,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甚至搞什么雇工剥削。听说在中国过去的“四清”运动中,曾经查获了一些所谓“地下工厂”的案件。在这种地下工厂中,货币事实上已转化为资本了,工人在这些工厂干活,就是为资本家干活。这种“地下工厂”在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法的,如有发现,立即取缔。但是在苏联,这种“地下工厂”早已变成地上工厂。在那里,所有的工厂企业、农庄都已成为官僚垄断资



产阶级剥削工农劳动人民的屠场了。

## 无孔不入

我们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在人和人之间开始建立和发展着同商品交换关系无关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有着优良的传统。可是，我们家族要繁荣昌盛，就一定要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中去。只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无处不在，我们家族才能根深蒂固地兴旺发达起来。

你们一定会说，你既不会走动，又不会象苍蝇一样嗡嗡飞来飞去，怎么能够无孔不入呢？其实要了解这一点也不难。等价交换原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经常出没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每天到菜场，付出钞票，买回各种副食品；到食堂付出饭票、代价券，拿到饭和菜，——这不都是等价交换吗？还有，你的工资或工分值，也是你向社会提供了劳动，社会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按照你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给予你的等量的货币。这里按照原则来说，也是等价交换。日子一长，许多人就把我们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当作了天经地义：付出多少，就应该收回多少。这个原则不但指导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而且给人们的社会生活以极大的影响。各位读者，当你收到一件礼物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快想到：“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要考虑送点礼物给对方。也许，这礼物是某人上次托你替他办成某一件事的酬谢吧？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会感到受之无愧，心安理得。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没有逃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厉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走的也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而是常常碰钉子，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去年，上海有个建筑工程队为一家工厂施工扩建厂房，工程队的工人干劲冲天，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临走，这家工厂自然要谢谢工程队。这时，我们家族的一位成员——该厂生产的一种热门商品便跃跃欲试了。他们准备去充当“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任务”这样一件事情的交换物。他们通过这家工厂的领导对工程队领导说，可以让工程队的同志每人低价购买一件热门商品。这件事被工程队的领导和工人谢绝了，他们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首先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在双方企业之间固然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计价付款，但是，这种原则决不能发展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以致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碰壁的事固然常有，但是，顺利的事也间或有之。“你帮了我的忙，我心中有数。”这是读者时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帮忙”和“有数”相交换，已成了一部分人的处世哲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被这种交换联结起来。某个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帮忙”某个社办工厂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些问题，结果，这个社办工厂“心中有数”，到时节，崇明的大闸蟹会爬过来，舟山的大黄鱼会游过来，山东的大红枣会落下来……，请看，“帮忙”和“有数”不是成了一种交换吗？我们家族通行的交换原则不是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了吗？

我们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不但渗入了一般社会生活领域，而且渗入了政治生活甚至党内生活领域。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是商品的人格化。严格说来，也是我们的同宗。就是他们，把等价交换原则带入了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彭德怀把共产党当作一个股份公司，把自己的入党看做“入股”。革命胜利以后，党就要给这位“大股东”以重要地位和大笔的“红利”。当然，彭德怀打错了算盘，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满足他的这种野心的。于是他凶相毕露，竟然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组织反党的“军事俱乐部”，抛出反党意见书，当作机关枪、迫击炮，疯狂向党进攻。还有一个林彪，那是比彭德怀还要大的一个军阀。他公开鼓吹，他混进革命队伍，是要做一桩“一本万利”的大买卖。按照林彪的说法，“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自然是“一本万利”了。林彪还按照商品交换原则拉山头、结死党，组织黑司令部。他一再鼓吹“诱：以官、禄、德”。谁愿意为他卖命，他就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作交换。“卖命”换得“高官厚禄”，这岂不是等价交换吗？他和他的死党就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合起来的。他的一个死党就鼓吹要搞什么“政治投资”，另一个死党则说：“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粉身碎骨”。真是赤裸裸的反革命政治投机商的语言。

在中国共产党内，象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一号人当然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只是一小撮。但是，把革命当作投资，把入党看成入股的，却也不乏其人。我们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也渗入这些人的灵魂中去了。他们公开向党伸手，要求按照商品交换原则，支付他以相应的地位、享受和荣誉，不能得到满足，就资产阶级派性发作，不顾大局，无理取闹。等价交换原则就象一根无形的锁链套住了他们的脖子。说实话，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我再进一步把他们孵化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不那么困难了。

## 旧土壤的新毒草

各位读者已经知道，按照我的本性，是要孵化出资产阶级分子的。在今日的苏联，由于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性质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改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新毒草得到了最适宜的生长土壤。我手头有一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苏修《真理报》，上面有一篇文章，颇能说明新资产阶级分子和我的关系。特摘译一段，以饷读者：

享有盛名的苏尤诺夫到底有多少骆驼？众说纷纭。一种估计是三、五十头，另一种估计是一百开外。

我们的苏尤诺夫要这么些骆驼干吗呢？他可不象古时候那样，迈步走在上驮的骆驼队前面。他担任的是十分现代化的职务——卡拉库姆运河二区总工程师。但苏尤诺夫很在行：驼肉能卖好价钱，上等驼毛的优点是有口皆碑的，驼奶可以制成提神的饮料。在市场上，一头骆驼价值一千二百卢布。五头骆驼就是

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八头骆驼就是一辆新式伏尔加。

当骆驼忘乎所以走得太远时，他就坐上他包租的、停在他私人足球场上的直升飞机。主人腾空而起，从一处飞到另一处，俯瞰旷野。

.....

够了。从苏修这一段交代中，你们可以看出，一个精神贵族，拥有包租的直升飞机，私人足球场，还有值十几辆伏尔加牌轿车的财产。而且他还雇佣工人替他放牧。这样的人，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就是商品和货币。这种人在苏联，不过是只苍蝇。比他大的家伙有的是。勃列日涅夫就是他们的总代表。对这一层，作为苏修御用机关报的《真理报》，当然要讳莫如深，不可与外人道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的存在，也就标志着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还存在。因为，谁占有了我，谁就占有了财富，进而就占有了权力，这就可以满足他的贪欲。在中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虽然受到了限制，但是我决没有停止在我这块旧土壤上培植新毒草的工作。我培植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原来是小生产者，有的是工人队伍中的败类，有的是共产党的叛徒，有的是国家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虽然来自各个方面，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贪婪。他们成天象猎犬一样，伸长鼻子，睁大双眼，到处寻找机会占有我们，恨不得一口把我吞食下去。他们是一批暴发户。在中国，林彪就是一个新暴发户的典型。“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这就是林彪和其他新暴发户的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这种新的暴发户和老资产阶级暴发户有所不同。老暴发户一般都是亲自掌握生产资料，公开雇工剥削。新暴发户由于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一般是通过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途径，攫取商品和货币。因此，在他们掌管的单位，总是要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把社会主义蛀得空空如也。这种手法，有些象白蚂蚁。一座楼房实际上已被白蚂蚁蛀了无数孔洞，但是外表上看起来还象一座楼房。当然，一旦等到这批蛀虫把社会主义大厦蛀空，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了。因此，这些新暴发户一般都具有两面派的特点。在我们的卵翼下，居然孵出这样的人物，虽然是必然的，倒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 江河入海流

话得说回来，我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没有一刻停止过培植新毒草的工作，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对我的行动的限制。我一越出轨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手就要把我拉回到轨道上来；一旦出现新毒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铲就要除毒草，化肥料。一句话，我已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乱开无轨电车，而必须遵循一定的轨道活动。这种处境，使我想起几千年前，在我幼年时候遇到的一个故事。

几千年前，中国还在尧舜时代，突然洪水泛滥，白浪滔天，一片汪洋，严重威胁着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尧立即派了一个叫鲧的人去制服洪水。鲧不懂得水性，见到哪里有洪水，就在那里堵。结果，他在哪里堵，水就往那里冲，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后来，舜继承了尧的位置，就改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这禹懂得水往低处流的规律。洪水大肆泛滥，就是因为无路可走。于是，禹采取了和鲧完全相反的办法，开凿河道，引水入河，奔向东海。当然，禹也改变不了水的本性。一有机会，水还是要泛滥成灾。可是，在江河堤岸的限制下，滔滔洪水，毕竟循规蹈矩地东流而去了。我时常暗暗自问：我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处境，不有点象洪水在大禹治理下的处境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法宝不放，坚决支持我们家族的成员——劳动力，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等等一个个起来造反，脱离了我们的家族。同我们家族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盛况比起来，这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紧接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调节作用。在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调节下，我们家族的成员谁应该出生，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多少都要订出计划，不准闹无政府主义，不能认为哪一种商品可以赚大钱，就生产那一种。这样一来，过去一直支配我们家族活动的价值规律，它的作用范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为所欲为了。价值规律还是有作用的，但必须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生产计划化了，分配、流通也随之计划化了。你们的基本生活资料，比如粮食、食油、布匹，就是计划生产、计划分配、计划流通的。二十多年来，这些基本生活资料的市场价格基本稳定，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商品制度实行限制的辉煌成果。各位读者，我天天跑遍全球，对各国市场情况了如指掌。象你们这样在二十多年中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价格基本稳定的国家，的确是极其罕见的。你们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这同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制度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制度下，我们家族中的货币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难以胡作非为。

我经常出没于美国。美国号称最“富”的国家，但是在战后二十六年（1946—1972）中，消费品价格竟上涨了一倍以上，有二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近贫困线的人，至少有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人。两者相加，约有五千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者接近“贫困线”，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苏联我也是常去的。那里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代，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相当不错。可是，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上台以来，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苏联的所谓“经济困难家庭”（类似美国“贫困线”以下家庭），据苏修报刊供认，就约占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两个超级大国情况如此这般，其反动、腐朽的程度可以想见。“两种制度两重天”，阅历很深的我是完全有资格作出这个判断的。每当我想到这一层，我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的限制，就认识到这是我生命史上必经的历史阶段，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只能在受限制的过程中求得发展。这就好象黄河、长江的流水，只能在河床中滚滚东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象治河民工时刻巡视水情那样，发现哪里有缺口，立即采取措施，加固堤防。因为，我的本性是不受约束的，尽管现在把我固定在河床中流动，我还是要东奔西突，时时造成缺口，给

人们带来危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是要限制我给人们带来的危害。至于我驯服地在河床中流动，你们不但不加限制，而且要鼓励我奔腾前进。你们比我更清楚，现在商品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还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还要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历史作用。等到我的历史作用发挥完毕之日，我也将象黄河、长江的流水一样，“大江东去”，东流入海不复返。那时节，你们的子孙将站在东海之滨，迎接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共产主义朝阳，劳动人民千秋万代盼望已久、为之奋斗不懈的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变为绚丽的现实了。

## 尾 声

各位读者，我回顾了自己的生平，上下数千年，踪迹遍天涯，你们对我的面貌、性格、特征，大概有所认识了吧。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法家曹操，在他的晚年说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是有点辩证思想的。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我也并不例外。当然，我不是算命先生，说不出我自己灭亡的具体日期，不过我生命的最终归宿是不能改变的了。

自从我出世以来，特别是近几百年以来，人类之间的政治斗争，乃至人们的思想行动、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很少有不同我和我家族的等价交换原则相联系的。看来，到了你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时候，习惯于在没有我的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我寿终正寝之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一切阶级差别和我差不多同时出生，我们一直形影不离；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无不同商品关系联系着；和这些生产关系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商品关系的统治或影响；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是商品关系的反映。这四个一切和我休戚相关，它们既从我这儿汲取力量，又是我成长发展的基本条件。你们消灭了这四个一切，我也就完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走进历史博物馆去了。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已经讲了我一生的经历和作为，虽说是盖棺才能论定，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对我作出科学的论定了。读者欲知马克思主义怎样评说我的生平，我建议你们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好，咱们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再见！

# 小评论

## 为谁辛苦为谁忙

新新机器厂 郑世瑤

我们有的同志为了儿女的所谓“幸福”和“前途”，常常忙碌得很。他们在子女面前说：我辛辛苦苦还不是为你们忙！这种为儿女辛苦、为儿女忙的思想对吗？

最近，看了老红军甘祖昌事迹的报道，深感上面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这位红军老战士，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里，转战南北打敌人，解放后，由于头部受重伤，坚持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对于儿女们呢，他说得好：“要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对那种为儿女私利忙的思想是多么深刻的批判呀！

这种为儿女辛苦、为儿女忙的思想，是剥削阶级旧的传统观念。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忙着向他们教唆剥削劳动人民的本领，以继承自己所占有的特权和财产，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从而达到继续其反动统治的目的。现在，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千百年来这种以反动血统论为基础的旧传统观念还在起腐化作用。林彪宣扬的所谓“诱：以官，禄，德”的修正主义黑话，就是要人们继承这种私有制的旧传统。那种为儿女的私利东奔西忙，甚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某些权力托关系、找亲友的行为，就是这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流毒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在我们无产阶级看来，儿女不是私有的财产，而是阶级的后代。因此，无产者不应当着眼于给儿女继承财产和权力，而是要他们继承革命的传统。老红军甘祖昌就是这样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大儿子锦荣，子女比较多。他看到社会上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羡慕，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甘祖昌是怎样对待的呢？“晚上，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同他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他指着‘废除继承权’的论述，对他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女儿平荣，回到家里对甘祖昌说：‘爸爸，我要去参军！’他的女儿想，“爸爸原来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只要他写个条子准没问题”。而甘祖昌又是怎样对待的呢？他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坚持说服女儿：“干部子女更应模范地遵守国家规定，不能闹特殊，这个后门不能开。”平荣

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见。甘祖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儿女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干革命“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因此，他严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这种无产阶级对待儿女的态度，是由这个阶级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彻底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同时消灭自己头脑中把儿女当作私有财产的旧观念，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有这样一种说法：为儿女们的幸福、前途操劳而忙有啥不可呢？关心儿女的前途当然应该！但你是象甘祖昌那样，忙着为把他们培养成吃得起苦，耐得起劳，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条件呢，还是忙于为把他们培植成脱离三大革命实践，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创造条件呢？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这是每个革命家长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而是为他们过个人的安乐的生活忙碌，使他们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的寄生虫，那样，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过去。这实际上不是为下一代争得幸福和前途，而是葬送了他们的幸福，丢掉了他们的前途！革命的青年们，如果当你的父母为你这样去忙的时候，你应该起来造反，并说服你的父母才对哩！

老红军甘祖昌对后代“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才是对儿女们真正的爱护和负责。为儿女留安乐窝忙，给他们特权和各种享受，实质上是在扩大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地，为资产阶级忙。今天的苏联社会中，那些在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及处于特权地位的一部分人，无不忙着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给他们的儿女捞到各种好处，把别墅、小汽车等财产传给他们，造成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苏修统治者在特权阶层中培植他们的后代，目的是妄图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这个历史教训和我们社会中少数青年变质的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即使是生长在革命家庭的子女，也只有把他们放到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否则，同样有可能会变质、变修，甚至使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江山变颜色。

“要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老红军甘祖昌的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这种“传宝”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一代人辛苦、一代人忙就能完成的，而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同志的关系，不是继姓传宗的关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原是一个不同姓的三家人，为了救中国、救穷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三代人的关系，一代一代往下传着“红灯”这个“传家宝”。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应该有这种“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的思想境界，跳出家庭的小圈子，为给千千万万儿女“留下革命传家宝”而忙，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今天，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在破除那种为儿女忙的旧观念，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形成了父母、子女同为革命忙的社会新风尚。最近，我们兴奋地看到，报上报道许多干部带头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的事迹。例如北京石油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八名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和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的应上山下乡的子女，全部报名上山下乡。这是一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新传统、新思想，我们的干部、党员和群众都要为把儿女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操心忙碌。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学习《论联合政府》的一点体会

谷 珊

我们党具有优良的传统作风。对此，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里说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重新学习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搞清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执行党的路线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增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党的三大作风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首先是因为它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的性质。毛主席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党员必须把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首位。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史。这正如毛主席所指明的，“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虽然表现不同，但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违反了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毛主席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



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就说明了我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学习理论不联系实际，或者只在口头上讲而实际上并不联系，那就是一种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背道而驰的极坏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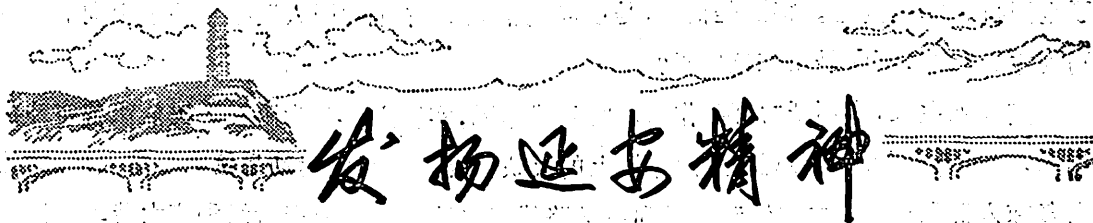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自觉地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到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年代，革命战士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模范行动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划清了界限；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战士又以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的平凡小事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全国胜利以后，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群众亲切地称这种情景是：“我们的老红军、老八路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语重心长地说过：“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仍然感到新鲜、亲切。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做到时时刻刻和群众心连心地联系在一起。

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也同样必须经过斗争。毛主席一贯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切不正之风作不疲倦的斗争。我们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内斗争历史经验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也是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有效的方法。我们党的历次整风运动，都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里深刻地阐明了为人民谋利益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辩证关系。只要我们坚决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及时地清除

思想上的政治灰尘，就一定能够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风，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坚持一种什么样的作风，从来就是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是教育我们的同志要保持一个好的作风，要反对那些不良的作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我们许多同志的切身体会都证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到处正在胜利地前进；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没消失。为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胜利发展，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刘少奇、林彪一类在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反对和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那套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搬到党内来，企图腐蚀我们党的健康肌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使党的三大作风进一步得到了发扬。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两种作风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严肃地提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到了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又一次提出：“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联系起来。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这是一条为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当前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进一步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风，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进一步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地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就一定能够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上海前哨农场青年工人 韩天宇

我爱这么一张照片：毛主席站在延安窑洞前，打着手势给八路军干部作报告。陕北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毛主席神采奕奕的面容，也照耀着毛主席身后那间十分朴素的土窑洞。

当年的宝塔山，到处都有照片上这样的窑洞。谁到延安来参加革命，就先得学会住窑洞。一九四〇年底，一批八路军干部从抗日战争前线返回延安党校学习，刚住上窑洞，还有点不习惯。一天，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他们，知道他们的思想后，就语重心长地讲了：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毛主席响亮地道出了一条真理。

窑洞，象征着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蒋介石这伙卖国贼，不打鬼子，反而丧心病狂地进攻陕甘宁根据地。他们出动重兵，修筑近万个碉堡，构成五道封锁线，妄图困死共产党，连一块麻袋片都不准进入边区。但是，共产党是压不垮的，马列主义是压不垮的。延安军民挥起铁手，挖出了几千几万孔窑洞。就在简陋的窑洞里，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一兵，过着同样的艰苦生活；就在筑满窑洞的山坡上，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飞转的纺车，披荆斩棘的镢头，击碎了反动派妄图困死边区的迷梦；就在窑洞温暖的土炕头上，成千上万的干部接受了延安整风的战斗洗礼，乘着马列主义的浩荡东风，奔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杨家岭和枣园的窑洞，在那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吃着小米饭，日理万机，为人

民辛勤地工作着。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毛主席书案上闪闪的灯光，透过延安窑洞，映红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心。窑洞是简陋，是艰苦，然而，一条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的马列主义路线，不就是出在这里吗？

搞马列主义，离不开“窑洞”作风。“窑洞”作风，实质上就是为阶级为民族艰苦奋斗的作风，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生活作风上的反映。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列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必须具备“窑洞”作风，不图享受，不谋私利，才能接受得了这一切。干革命、搞马列主义又不是一帆风顺的，饿饭的威胁、杀头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恶风恶雨总是相继频仍，也只有具备“窑洞”作风，无私无畏，才能经受得起这一切。那种一个心眼贪图享乐、“利己多欲”的自私鬼，岂会是什么“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当年，有那么一个花花公子，为了出人头地，从北大跑到抗大，可是窑洞艰苦的环境叫他受不了，他终于开小差，投奔国民党去了。可见，背叛了“窑洞”作风，也就背叛了马列主义。我们说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其实就是说唯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才是搞马列主义的保证。这是因为，“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阶级的生活作风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就是如此紧密相联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观园”出封建主义，“高楼洋房”出资本主义，只有“窑洞”才出马列主义！

从延安朴素的窑洞，到北京雄伟的天安门，五星红旗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幸福。今天，高楼、电灯再也不被蒋介石们霸占了。祖祖辈辈睡“滚地龙”的工人搬进了工人新村，祖祖辈辈住茅草棚的贫下中农盖起了新瓦房。不用说，革命干部，包括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生活、工作过的同志，也早已分配到合适的住宅和办公大楼了。但是，住了高楼，不能忘记窑洞。革命胜利带来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但决不能因此而丢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忘掉革命前辈在三十五年前每天吃三钱油、五钱盐、睡窑洞、点油灯的日子。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我们绝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从五·七干校到送子女上山下乡，“窑洞”作风大大发扬，延安精神代代相传。“山丹丹开花满山崖，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搞马列主义后继有人。延安的窑洞，永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保持“窑洞”作风，才能战恶风，顶黑浪，拒腐蚀，永不沾。这样，就是住了高楼，甚至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处在最繁华最集中的高楼大厦之间，你看，马列主义大旗又举得多高！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窑洞前的这张照片，是无产阶级的传家宝，我爱它，亿万人民都爱它。革命在发展，祖国在前进，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但是，延安窑洞所标志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忘记。让我们铭记住这个真理吧。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 一份鼓舞人的个人计划

江南造船厂青年工人 黄永林

“什么是延安精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先读一下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一份鼓舞人的个人计划。

一九四四年延安的春节是在大生产热潮中度过的。年初四《解放日报》醒目的头条新闻，就是林伯渠同志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该计划共有四项：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卅三年一月廿五日（一九四四年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林伯渠同志的工作不是已经够繁忙了吗？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称得上是事务纷纭、头绪众多。再说他年事已高，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怎么能够让他象青年同志那样花偌大精力去搞生产自给呢？许多战士早就看不过去，纷纷写信给林伯渠同志，要求为他代耕。但林伯渠同志却不是这么想的。他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想到生产自给“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想到一个革命干部在为人民利益而斗争时所应担负的责任，应该在革命斗争中以身作则地做出榜样。是啊，对一个革命干部来说，他的工作是既不能计报酬也不能讲定额的，是应当吃苦在群众前头、享受在群众后头的。

四条计划，并不深奥。但其中反映出的风格，却是无产阶级所独有的。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有谁见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这么干过吗？他们带头实行的是“治人者食人”这一套剥削阶级的信条，尽管有时嘴上也假惺惺地说点同情“稼穡之苦”的话，但仔细一瞧，却分明可以看见他们的嘴角边上正在淌着人民的脂膏和鲜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是写得挺不错的。但如果是文人学士、太太先生在饱享宴席之余，摸摸肚子，剔剔牙齿，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摇头晃脑哼出了这几句诗，这桩事的本身就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在剥削阶级那里，官越大，“食”得越多，一个巍巍然的“万户侯”，就是一个吸食“万户”劳动人民血汗的大吸血鬼。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只有共产党才把这一套全给翻过来了。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干部要带头服务于人民，只有为革命多做工作的义务，没有计功劳、讲报酬的权利。职位越高，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担子越重，这已成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自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又岂只是林伯渠同志？当时党的许多领导干

部，都订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就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也亲自拿起了锄头，春种秋收，身先士卒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吗？

领导干在前头，群众就有劲头。据当年延安的报纸记载：林伯渠同志的生产节约计划一公布，就“鼓舞了无数同志”，“各机关学校闻讯后，生产节约热忱更为高涨，杨家岭等机关，在春节假期中仍努力进行学习生产技术之突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要依靠最广大群众来一起干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领导带头干。领导者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又反过来给群众斗争以很大影响的。领导者的一言一行及其生活作风，对下级、对群众，都起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当年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搞得那么热火朝天，证明了各级领导模范表率作用的重要性。今天在新的革命斗争面前，广大革命干部保持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带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带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冲锋陷阵。延安精神在各地胜利地行进，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无论在革命和生产上都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

读者中该有不少是处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吧？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与回忆延安时代的革命历史，它将鼓舞着我们进一步鼓起革命的干劲，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迈进！

## 八路军的“样子”

上无十六厂青年工人 陈传宏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绥边区，有一次在一个严冬的深夜，一支八路军队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村子宿营。一位团长为了号房子，到老乡家去敲门。这家房东是个老太太，因为穿衣慢，出来迟了。一开门，见是八路军，她很高兴。可那位团长却见面就责问道：“为什么敲门不开？快给腾房子！”

老太太一愣。她是很了解八路军的优良传统的，对团长这种耍官腔的态度很不满意，禁不住说：“嗨！你这当官的就这样说话吗！”

“咳！别废话，我们走了一天了，快去腾房子！”团长更不耐烦了。

老太太也生气起来，用严正的口吻向团长说：“越这样，我就越不给你腾！我没见过八路军象你这样子的！”

一席争论，发人深省。

“没见过八路军象你这样子的！”是的，我们党和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从来是到了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打水扫院收庄稼，婶子太娘，亲如一家，哪见过这

样向群众吹胡子瞪眼睛的？是尊重还是训斥群众，这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态度问题，而是反映了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个根本原则问题，反映了人们的相互关系。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等级森严，以贵凌贱。“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是剥削制度下人们相互关系的生动写照。反动军队反动官吏对老百姓从来就是这样凶神恶煞、颐指气使的。但是，自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出现以后，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毛主席所深刻地指出的那样，“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个“唯一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式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明确地写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在老太太和一切革命人民心目中，八路军就是这个样子的。反之，动辄训斥群众，或者是向群众伸手，就叫做“不象样子”。

但是，那位团长在敲门的当时却缺少这种“样子”观。就象他提高觉悟之后检讨的那样：“我先前总以为我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她老太太开个门还慢慢吞吞地，心里便不痛快。”他自以为替群众跑了路、打了仗，群众理应报答他的恩情。因而一开始老太太批评了他，他不但不检讨，反而理直气壮地向上级告了老太太的状。究竟谁是谁非呢？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说了：老太太对得很！因为她知道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才这样严格地教训我们；如果是军阀的军队，她就不讲了。这是老百姓政治觉悟提高的表现，有什么不对呢？——多么深远的目光！表扬老太太，就是赞成和支持老太太的“样子”观，就是不准任何人违反新型的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

为群众跑了路、打了仗，就可以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吗？这种“样子”观，看来有理，其实无理。说有理，你看，我替群众出了力，群众反过来报答我、侍候我，岂不是平等来往、公平交易？其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在那里，一切都被搞成了买卖关系、金钱关系。《沙家浜》里有个刁小三，在打家劫舍时说了一番振振有辞的理由，“老子们抗日救国，给你们赶走了日本鬼子”，你们得“慰劳慰劳”！不管刁小三们是否真的向日本鬼子放过几枪，他的这番话，倒可以说是商品交换原则的体现。在这种原则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所有的人都是资本的奴隶；谁有资本，谁就高人一等。刁小三是以替老百姓“赶日本鬼子”作资本的，于是他也就高老百姓一等了。这种样子，是国民党军队的样子，反动派的样子。至于人民军队就完全相反。从马克思以来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不计较功劳大小的，他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就拿那位八路军的团长来说，尽管性情急躁，向房东老太太发了脾气，但一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就立即检查，坚决改正，保持了革命者的本色，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样的军队，正如鲁迅所常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这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样子”！这也就是“延安精神”！

今天，离开老八路时期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这种八路军的“样子”却将祖祖辈辈地继续保持下去。毛主席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永远保持八路军的“样子”，我们将无敌于天下！

# 延安干部的品格

上海机械施工公司 吕长生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曾经订过一个有十条内容的公约。这个干部公约，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明确规定着每个干部必须坚持的政治方针、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和生活作风，从各个方面体现了延安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其中的第五条指出：“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公约中指出的这个“品格”，划清了无产阶级干部与剥削阶级官吏的根本界限。

历史上，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成员们推举出来的头领，曾经是不知贪污、剥削为何物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了，氏族分化成不同的阶级了，头领们也就由社会公仆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了。这个时候，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再也摆脱不了这个阶级特有的贪婪的特征。“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在那个社会里，官就是盗。做官，就是为了更多地“盗”，亦即更多地剥削、贪污。从此，盘剥压榨、贪污腐化、鱼肉百姓，就成为一切剥削阶级官吏必备的品格。“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封建社会里那些所谓“清官”的写照。一直到当代资产阶级头子林彪，不是还在那里嚷什么“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吗？但是，延安的干部，却一反这一套。在他们看来，“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他们的品格，就是“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延安的干部是无产阶级的干部。他们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然，也就只有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才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廉洁规定为自身的品格。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延安和西安，两种不同的干部品格，执行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请看延安的干部，他们不分上下，和老百姓住同样的窑洞，吃同样的小米；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们荷锄上山，开荒种地，实行机关自给。有一次，一个干部有任务从绥德去延安，路途遥远，按理可以骑马。但时届农忙，他就坚持“让马留



在生产上”，徒步“急行到达”。——廉洁的品格，不是讲讲的，而是要办到的，这就象他们在公约里说的：“知法守法”。就这样，陕甘宁边区建成了当时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廉洁政治，而延安则成了人们日夜向往的圣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却是一片黑暗。蒋介石集团虽然嘴上讲“秩序”，讲“反贪污”，而实际上却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在那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廉耻扫地，知法犯法，胡作非为。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都出现了民生雕敝、民怨沸腾、民变蠢起的严重危机。事实证明，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品格，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干部队伍。那些国民党官吏，手上在贪污枉法，嘴上却喊廉洁执法。且不说他们即使做到了“廉洁执法”，也不过是遵守了地主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瓜分剥削权利的界限；何况就是这个法，他们也执不了，剥削阶级是贪得无厌的，哪里受得了什么束缚？非法剥削，只能是他们合法剥削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是延安干部的品格，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品格。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我们全党，在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里，这个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实行着商品制度、按劳分配，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的三大差别，国际上也还存在着帝修反。在这个环境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必定会侵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贪污堕落、行贿盗窃等现象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永远根绝。不过，我们社会中之存在着这类现象，与在苏修社会那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法权被统治集团竭力加以扩大。而苏修党和政府里层出不穷的贪污腐化，在本质上正是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不可或缺的，因而它总是明里遭反对暗里受保护，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贪污腐化是对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反动。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对这块土壤上冒出的贪污行为将随时给以制裁。而在苏修社会那里，由于所有制的性质已经变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党和国家，这就决定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化为贪污犯，而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小撮苏联最大的贪污盗窃犯。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广大革命干部所做到的，也远远超过了边区干部公约的内容。但是，读了这个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干部公约，仍然使人感到分外亲切。早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就谆谆教导说：我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延安干部的革命品格！

# 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

1943年5月8日公布

(适用于区级以上)

## 一、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

注释：施政纲领是我们的政治方针，法令决议是它的具体化，务要忠实奉行，贯彻到底，不可阳奉阴违，有始无终。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个利益。

注释：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组织原则。对上级要尊重，要服从，有意见要提，但不可闹独立性。对下级要了解，要关心，要倾听意见，不犯官僚主义。对同级或有关部门，要照顾全局，认识大体，要关照别人，不犯本位主义。要严格恪守政府纪律，要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

## 三、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

注释：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决定一个政策或一件工作时，要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免得犯主观主义。执行决定时，又要深入的检查执行程度，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以求贯彻。执行完毕或告一段落时，还要总结经验，以便提出新的任务，扩张成果。

## 四、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

注释：这是我们的工作精神。要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勇敢任事，切实负责，有自动性，有创造性，有计划性。不避难就易，不避重就轻。不要指定做才做，不指定就不做。

## 五、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注释：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 六、互亲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

注释：这是我们内部团结的原则，要本施政纲领与民主集中制的总则，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劝善规过，切磋琢磨，互相帮助，善于人同，不存成见，不意气用事，不一意孤行，不一味迁就，不互相包庇，不同流合污。

## 七、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

注释：群众是我们的依靠。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不贪占群众一点便宜。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

## 八、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

注释：八路军是我们的支柱，要尊重军队，帮助军队解决困难，保证军队给养，努力优待抗属，安置退伍军人及抚恤伤亡，密切军民团结。

## 九、提高政治警惕性，严防敌探奸细。

注释：要严防敌探奸细和破坏分子的一切活动，要时刻警惕自己，反对麻木不仁，反对太平观念。凡有关政府和军队的机密事件，要严守秘密，要保藏公文印信。

## 十、努力学习。

注释：发扬相互批评及自我批评，提高自己，帮助别人，不自高自大，不自暴自弃。

本公约经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由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之。

(摘自1943年5月16日《解放日报》)

# 光明的一生

——记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萧楚女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个月。汉阳城头硝烟浓重，火光冲天。守卫汉阳的革命新军在清王朝反革命军队的连日猛攻下，寡不敌众，枪声逐渐稀疏下去。反动军队嚎叫着向前涌来。正在这危急时刻，忽然有一个新军士兵从火中跳起，扑向城楼上的大炮。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只见他圆睁大眼，微厚的嘴唇紧紧咬着，眉间凝聚着英武的气概。他迅速地点燃了火炮。轰！炮弹在敌人堆里爆炸了。他又点燃了第二炮、第三炮，轰！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剩下的四散溃逃。新军士兵们涌向这个青年勇士，向他发出了欢呼：

“好样的！萧秋！”

“打得好！打得好！”

这个叫做萧秋的青年勇士，就是早年的萧楚女同志，这时他才十五岁。

一八九六年春，萧楚女诞生在汉阳城外鹦鹉洲上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鹦鹉洲象一只手臂伸向长江，是武汉一带的木材集散地。从湖南洞庭湖和湖北汉水流域运来的木筏，大多在这里进行加工整理。萧楚女早年丧父，自小就跟着母亲在木材场上拾一点树皮、木屑，卖到集上去，换一些粮食充饥。十三岁时，他进杂货店当学徒，又转到茶馆当“跑堂”。为求活路，他先后辗转流浪鄂、赣、苏、皖等省的沿江城市，作小贩，当报童，在轮船上作火伙，尝遍旧世界的艰辛，同时也使他深深地了解了底层社会的生活。少年萧楚女在这所“社会大学”里，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懂得工人、农民的痛苦和欢乐，为他后来从事理论斗争打下了有用的基础。

当萧楚女飘泊长江，无处立足，重新回到汉阳的时候，武汉三镇正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十五岁的萧楚女也就在这时参加了新军。接着，发生了保卫汉阳城的激烈战斗。

火炮击退了清王朝的反动军队后，萧秋站在城楼上，眺望被大火吞没了的汉口城。反动军队正在那边纵火烧屋，三十里长街已成了废墟。他紧握拳头，痛苦地想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外国强盗和封建军阀卡住了喉咙，就象龟、蛇两山锁扼着长江。我们的民

族，需要有千百万挽救危亡的志士啊！”

道路茫茫，何处求索。他读着古代楚国法家诗人屈原的《离骚》，从“忽反颜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两句诗中受到了启发，取了屈原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女”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了他要作为“楚女”的抱负。从此，他就叫作萧楚女。

## 找到了革命的真理

萧楚女是怀着救国的壮志参加新军的，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它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以致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反袁不成，亡命日本。国内的情况一天坏过一天，多少革命志士怒目苍天，空怀壮志，强忍仇恨看新贵。萧楚女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傍晚，萧楚女漫步江堤，看到奔腾的长江，触景生情，喟然长叹道：“大江滔滔，何处是归程？我有救国的志向，又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呢？”从此心中渐有去意，感到再留在新军中，无异于替军阀作工具，最后终于毅然退出了新军。

退出新军以后的萧楚女，苦苦地探索着革命的道路。

这时，反动势力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萧楚女的一个好朋友不幸遇难。朋友的父亲给了萧楚女一点钱，要他去乡间避一避。萧楚女拿这钱买了许多书籍。出身穷困的萧楚女，自小既没有进过“洋”学堂，也没有上过私塾，只在当学徒期间跟人认了一些字。他避到乡间后，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当时中学的全部文、理科课程。后来，他能够先后胜任国文、化学、物理、数学等课的教师，在同事中传为美谈，就是靠自学打下的根基。

从乡间出来，萧楚女进了湖北蚕桑讲习所。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耕读式的职业训练班，完全不合萧楚女寻找革命真理的要求，但既然有了一个学习环境，总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讲习所照例要上课，萧楚女并不重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学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都是他自学的內容。他按照自己的计划读书和写作，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

萧楚女在蚕桑讲习所毕业后，面对着的依然是一个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社会。他为了找出改造社会的政治方案，写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批评时政，抨击社会弊端。他的文章鲜明、泼辣、深刻，给当时沉闷的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步倾向的《大汉报》，聘请他当了副刊编辑。

但这样的报刊，还不是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指导的，因此依旧是旧的思想武器。直到爆发了五四运动，才正式出现了中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湖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董必武、陈潭秋，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等一批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进步团体利群书社。一九二〇年，萧楚女经恽代英介绍，参加了利群书社。当地的进步青年经常到利群书社来阅读新书报，讨论国内外时事，探讨各种思潮的是非。就在这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译本出版了。

萧楚女从利群书社拿到书后，日以继夜地攻读，常常从白天一口气读到深夜一、二点钟。同时，当时在湖南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毛泽东同志，特地派人到武汉来，向利群书社成员详细介绍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这对于萧楚女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终于懂得，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武器，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了萧楚女的心，使他从迷茫曲折的历史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

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利群书社中，恽代英首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由恽代英介绍，萧楚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这个苦苦探求革命真理的青年，经历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过坚忍不拔的奋斗进取，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依归。从此，他开始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向旧世界勇猛搏击！

## 开 辟 西 南

一九二二年深秋的一天，萧楚女受党的委派，离开武汉，乘船西上，前往四川。他站在甲板上，望着两岸高峰，一线江水，听着船工吃力地打着川江号子，心中联想到艰巨而光荣的中国革命事业，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前进的征途上，正象川江夜航，充满着种种艰难险阻。但他丝毫不害怕困难，他满怀着胜利的信心。

萧楚女入川，是党中央派去开辟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他先后在泸州川南师范、重庆联合中学和国立第二女子师范教书，并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

在封建军阀势力的武装割据下，四川连年战乱，人民痛苦不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战火延及数百里，前后相继几个月，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学生首先起来发难。这一年冬天，重庆和川东的万县、川南的泸州一带发生学潮。军阀用武力进行镇压，无理地开除了许多学生。

萧楚女看到这是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运动的好时机，就决定举办一所“重庆公学”，专门吸收被开除的学生入学。

十二月初，在重庆半边街一座三层楼的风子里，重庆公学成立了，学生人数共达二百多人。在这所学校中，教师不拿薪俸，学生不交学费，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异军突起，开重庆教育界的一代新风。学生们一进门，就感到耳目一新，一个个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成为当地青年运动的生力军，许多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但反动派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新生事物存在的，不到半年，就强行解散了重庆公学。

“公学”虽散志未散。萧楚女又把进步青年团结在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社等青年团体周围，这些团体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的。它们每逢周末或星期天，就在张家公园或南岸的南山等僻静的地方活动。萧楚女经常亲自参加，引导青年认清当时正在毒害着一部分青年的安那其主义、基尔特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的反动性，区

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不同。

在萧楚女领导下，重庆地区的青年运动逐步与工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他们先在印刷工人中开展活动，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到航运工人、码头工人、邮电工人、猪鬃工人的心坎上。马克思主义一经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重庆地区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改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展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期。一九二四年秋天，萧楚女领导四川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成立了“四川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古老的四川城乡，汇集起了革命的洪流。

革命力量的迅速聚集，预示着新的斗争风暴的兴起。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商轮“德阳丸”偷运伪币到重庆，不择手段地企图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当中国检查人员上船进行检查时，日本不法商人怕劣迹暴露，竟野蛮地将四名中国检查人员推下江心淹死，事后还无理地要中国方面道歉和赔偿。卖国的军阀政府一一答应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让“德阳丸”携带着凶手在长江里扬长而去。这个消息激怒了重庆各界人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

这时，萧楚女已经担任了《新蜀报》主笔。“德阳丸”事件发生后，他在《新蜀报》上接连发表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坚决谴责军阀政府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萧楚女领导重庆各界人民在重庆的打枪坝召开了有六十四个群众团体参加的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萧楚女亲自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他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卖国！”“交出杀人凶手！”

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守在门口的四川军阀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萧楚女带领一批群众大步走进领事馆的大门，怒不可遏地当面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萧楚女严正指出：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容忍领事裁判权就是容忍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绝对不行的！萧楚女怒火万丈地指着日本领事的鼻子大声喝道：“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杀人要偿命，中国人民有权缉拿凶手，决不允许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这义正词严的一席话，训斥得一贯骄横跋扈的日本领事缩着脑袋，一声不响。事后，萧楚女又通过《新蜀报》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斗争。群众痛快地说：“这一场斗得好，争了中国人民一口气。”

萧楚女主编《新蜀报》近三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尖锐而深刻的文章。他同群众斗争息息相关，因此他的文章总是最能道出广大人民的心声。近三年中，他的文章近千篇，超过一百万字。他的革命活动，搅得四川军阀心惊胆战。一九二五年上半年，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威逼《新蜀报》开除萧楚女，并扬言要驱逐萧楚女出川。萧楚女闻讯，报之以鄙夷的一笑。军阀见赶不走萧楚女，露出了杀人凶相，准备下毒手了。党获得这一情报后，指示萧楚女转移到新的地区去战斗，萧楚女这才离开了四川。

萧楚女走后，重庆市的学生、工人和店员指着《新蜀报》气愤地说：“没有萧先生的文章，我们不订报了！”表示了对萧楚女的深切崇敬和对军阀暴行的强烈抗议。

## 理论战线上的一员猛将

萧楚女离开四川，沿江东下。两岸景色依旧，但斗争形势已与三年前他入川时大不相同了。四川的党、团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也已广泛形成，以五卅运动为序幕的第一次大革命，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山城重庆和“天府”盆地，而四川军阀对萧楚女的声声嚎叫，只不过如同川江两岸啼不住的猿声，岂能动摇革命战士前进的意志。萧楚女站在船面甲板上，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瞻望未来，心胸开阔，直向上海进发。

萧楚女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和恽代英等一起编辑《中国青年》杂志。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的第一个刊物。萧楚女热爱要求进步的青年，关心青年一代选择什么道路，他经常亲自在刊物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青年们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包括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失学失业、婚姻恋爱等等，细致入微地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和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他的文章立论正确，感情奔放，文字俊逸，深受广大青年的喜爱，青年们把萧楚女称为“青年的良师”、“真理的战士”。许多青年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尤其使青年们敬仰的，是萧楚女以《中国青年》作阵地，奋起犀利的笔锋，刺向一切恶势力。他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文章，气势壮阔，犹如千军万马奔驰在原野上，震撼着整个社会。

斗争是这样引起的：随着革命的更加深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日益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新右派的“理论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的老伙计戴季陶，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和七月，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本反革命小册子。戴季陶拾起了孔孟之道这件破烂武器，想为蒋介石的“登基”砍出一条路。牌号是孙文主义，要害是反共反人民。

在这样的严重关头，叛徒陈独秀软弱退却，非但没有给予坚决回击，反而乞求这些反动家伙“在工业未发展前不要去组织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更助长了新右派的气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强烈的战斗愿望在萧楚女心底里升起，他挺身而出，决心给戴季陶主义以迎头痛击。一天，萧楚女到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去，这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在上海的领导机构，萧楚女经常到这里来工作。他进了大门，看见戴季陶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正打着湖州官腔贩卖着他的歪理。

戴季陶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的利益。”

萧楚女听了十分愤怒，大声驳斥：“什么‘仁爱之心’？这是骗人的胡言。所谓人类的仁爱，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没有过。我们努力于民众的阶级教育，正是为了要把农工做成革命的中坚，叫农工阶级自己以要求解放而革命，决不能等待剥削者发善心。”

戴季陶呐呐地说，孙中山的思想，就是继承了孔孟的学说。

萧楚女迅速反击：“把孙中山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什么‘仁’的基础上，这是对孙中山

的歪曲。如果戴先生以为‘仁’就是革命，我看戴先生现在不必再坐在这环龙路的执行部里，枉谈革命，且去庐山白鹿洞学朱熹消暑讲道，等到每个工人农民都能背出《大学》、《中庸》，然后再使他们扛上锄头长矛，揭竿而起，岂不是更好吗？”

戴季陶眨巴着三角眼，正想负隅顽抗，萧楚女单刀直入，紧紧相逼：“戴先生如果没有存一片欺骗农工阶级的坏心，如若不想在此时欺骗农工，到革命成功后便抛弃他们，就应当承认现在有必要对农工进行阶级教育，要他们警惕在第二次辛亥革命时被主大夫所抛弃，就象一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抛弃并且镇压了农工一样。”

这最后的一段话，淋漓尽致地剥掉了戴季陶主义的画皮，弄得戴季陶把脸拉得长长的，坐着既不是，走开也不好，浑身出汗，狼狈不堪。

萧楚女继续为革命而战斗着。八月，他离开上海赴河南工作，途经武汉，以“抽玉”为笔名写下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九月到达洛阳，又写了《戴季陶拥护掠夺弱小民族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请看他口中所说的人口问题》。这两篇讨伐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编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公开出版发行，它们抓住戴季陶主义取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反动核心，驳斥戴季陶关于工农阶级斗争“贻害”“国民革命”的胡说和“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叫嚣，揭穿了新右派妄图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阴谋。

在萧楚女等马克思主义战士鞭辟入里的剖析下，戴季陶主义原形毕露，成为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这一下可急坏了陈独秀，他急忙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响导》上，盗用党中央名义发表了一则卑劣的声明：

兹查有萧抽玉所著之《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按其内容纯系萧之个人意见，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特此郑重声明。

但是，萧楚女非但没有被陈独秀的高压吓倒，反而从中进一步看清了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重要性，促使他紧紧揪住戴季陶主义这个凶恶敌人不放；同时也激励着他把已经开始了的对另一股反动思潮——国家主义派的战斗更坚决地进行下去。

国家主义派是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而生的一个杂种。它是由一帮封建买办阶级政客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纠合起来的反革命政派，听命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专以反共为职业。他们办了一个《醒狮》周报，又称为“醒狮派”，人们却直截了当地称它为“狮子狗”即哈巴狗。这伙人，自称要在理论上摧毁共产党，其实他们自己实在贫乏得可怜，只能以超阶级的国家、民族为幌子，贩卖一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的破烂货。

萧楚女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早在重庆时就已开始了的。一次，他到一所学校去与教师讨论问题，一个国家主义派分子竟主动出来挑衅，污蔑马克思主义是领卢布人的赤色宣传，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萧楚女鄙夷地斜视了这个家伙一眼，抚案而起，说道：

“我问你，谁使得种庄稼的没有饭吃？谁使得造房子的没有屋住？谁使得缝衣服的没有衣穿？是地主和资本家！马克思主义就是讲的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道理。工人农民都欢迎马克思主义，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害怕它传入中国。你们也胡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



国情,说的完全和地主资本家一个腔调,你们何不将国家主义派改名为地主资本家派!”

接着,萧楚女的话锋更锐利了:“我们向左转,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在一起,争人民大众吃饭的权利,光明磊落;你们向右滚,抱金圆叮当的资产阶级大腿,图骄奢淫逸,不过是哈巴狗一群,哪有资格到这里来胡扯!”

这快刀利刃般的揭露,使那个国家主义派分子面孔涨得象猪肝一样,下颚抽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岂有此……”,最后一个“理”字还没有说出口,就慌忙夹着尾巴溜跑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萧楚女发表了《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对国家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驳斥。这本书一出版,立即风靡全国,成为革命者和一切进步人士的必读书。此外,萧楚女还写下了大量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战斗文章。

萧楚女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他指出,“阶级和国家,系同始同终相并存亡的东西。”因此在提到国家时,必须认清是什么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能爱代表自己利益的国家,而绝对不爱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派高叫爱国,他们要爱的国家,只代表“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绅士,买办……和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所以国家主义只不过是封建买办专政的代名词而已。

萧楚女集中火力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的两个动听的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家主义派口里说要外抗强权,实际上却在替帝国主义辩护,说在中国并无帝国主义资本的侵略,因此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萧楚女愤怒地指出:“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这便是醒狮派‘大无畏’的外抗强权!”至于所谓“内除国贼”,那更是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难怪疯狂镇压爱国运动的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竟大模大样地说:“我是一个真正爱国的国家主义者,我只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下,国家主义派声名狼藉,许多国家主义团体纷纷瓦解。“中国少年自强的会”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份宣言,表示“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有一个青年看清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后,脱离了这个反动团体,参加到进步的青年运动中来,不久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最后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这个事例,是对国家主义的又一有力批判!

###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六年五月,应州城里绿树成荫,红花盛开,古老的“番禺学宫”,一派热烈景象,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开学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所长。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的萧楚女被调来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助手。讲习所大部分教员是我们党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兼任的,只有萧楚女是专任教员。他日以继夜地为培养无产阶级农运干部而呕心沥血。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萧楚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把引导学员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在讲授《帝国主义》课时，组织学员学习列宁的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暂时稳定时期，机会主义者利用这个假象，竭力散布世界资本主义歌舞升平、没有社会矛盾的谬论，掩盖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根本趋势。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萧楚女查阅了几十种报刊和书籍，集中了丰富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政治形势。他告诉学员们：“帝国主义目下正在：一方面尽量地长大它底最后限度的‘胖子’；另一方面，开掘埋葬其最后胖体的坟墓。”他说：形势的发展，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新的革命浪潮终将要到来，一切为它们粉饰太平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萧楚女组织了三百多名学员，去海丰考察农民运动，从实际斗争中学习。海丰是我们党早期农民运动杰出领导人彭湃的故乡，是南海之滨农民运动的一面鲜艳旗帜。学员们乘船出发，沿着海岸东航，夜里到达汕尾。上岸后，大家精神抖擞地趁着月色行军。队伍在稻梁岸上走着，沿途的农民协会会员兴高采烈地在颈项里佩戴着红带子，敲着锣鼓，舞着狮子灯，赶到村外来欢迎。“共产党万岁！”“农民万岁！”“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声此应彼和，震荡在稻田、蕉林的上空。

按照萧楚女的安排，学员们都被分配到各基层农会去工作，他们调查地主怎样压迫农民，农民怎样组织起农会来反抗，农会成立后做些什么事，他们还和农会会员一起，直接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和审理，监督地主执行减租，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学员们亲身感受到农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几千年的封建势力踩在脚下，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事后，有一个学员激动地写文章说：“运动本身教育了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强烈地吸引到运动中去，觉得自己和农民表里如一地站在一起了，甘愿为他们而流血牺牲。”

萧楚女热爱学员，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付在学员身上。他白天深入学员，晚上又工作到夜很深，甚至天上的启明星已经在东方消失了，他的屋子里还亮着灯。日子一长，他为革命长期劳顿所染上的肺病，复发了。

夏天，萧楚女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多讲几句话，就要咯血，往往把手帕都染红了。但他依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上课，从不中断。学员们担心他的身体，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要他坐下讲。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三百多人的大课讲起来是很吃力的。为了让每一个学员都能听见，萧楚女总是坚持站着，大声地讲，悄悄地把血吐在手帕里。学员们听着听着，忍不住流下泪来。

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萧楚女暂时离开农讲所，住进了东山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心里仍惦记着农讲所的一切。医生禁止他说话，他就要学员把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收集起来交给他，他忍着病痛，半坐半躺地靠在床上，吃力地为学员们作出书面回答。七月六日，他回答了关于唯物史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一批问题后，又写下这样几行话：“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且先拣简单的笔答于下，其余多言方能明了者，则请俟我稍好再同大家细说。”字里行间，闪耀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重返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愿。

## 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九二六年冬，萧楚女的健康稍有好转，就要求工作。由于农讲所学员已经毕业，党分配他重返黄埔军校。

这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象急风暴雨一样席卷半个中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埋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积极实行收买。在这种情况下，从蒋介石的大本营南昌刮出了阵阵阴风，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言论日渐增多，并且层出不穷地出现了拘捕、残杀农民运动领袖和革命群众的事件。豪绅们又神气起来了。

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不许农民革命，大叫“口号过高”，“行动过左”，要“纠偏”。他自愿放弃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要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

政治风云的急剧翻卷，使萧楚女思虑万千，夜不能寐。他推窗伫立，听珠江夜潮如吼，心中升腾起斗争的激情，回到桌前，振笔疾书，直到天明，对陈独秀、蒋介石反对农民运动的言论痛加挞伐。他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外阶级敌人污蔑农民运动的罪恶目的：“现在有一股有意识要摧残农民协会的右派和反动派，看见农民协会真能代表农民利益，看见农民组织真已强大，与他们的生活相冲突，便拿住一两个不好的农民协会分子，硬诬农民协会是土匪的组织，想勾结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它。”萧楚女热情歌颂农民运动，指出右派所指的“流氓”、“土匪”，都是革命的闯将，斗争的先锋。他们的革命举动，土豪劣绅恨之入骨，于是就不惜造谣污蔑，戴上种种罪名。萧楚女对农民运动的分析，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萧楚女勇敢地坚持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屠杀革命群众的一周年。从北伐前线，不断传来蒋介石在沿途残害工农的消息，这个反动成性的新军阀走一路、杀一路。萧楚女决定借“三·一八”作题目，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

这一天，黄埔军校礼堂人头拥挤，大家纷纷猜测政治教官萧楚女今天要作什么讲演。

萧楚女走上讲台，扫视全场，目光停在一小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脸上，劈头问道：

“阶级斗争是能够用人力消灭的吗？”

全场肃静，连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反动而又愚蠢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一时摸不着头脑，进步学生却知道他们敬爱的教官萧楚女马上就要向敌人发动进攻了。

“段祺瑞想用屠刀消灭工农”，萧楚女继续说下去，“他以为工农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消灭了，反动统治就安稳了。不！阶级斗争是既不能以人力去造成它，也不能以人力去消灭它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萧楚女锐利的话锋，刺痛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他们浑身颤抖，害怕萧楚女还要射出更厉害的子弹来。只听萧楚女又说：

“革命队伍里的右派，一边打击工农，一边又想操纵工农。他们以为工农是同以前的会匪一样，可以作为自己‘革命’的工具。所以他们就分裂工农的团结，利用工农贵族压迫觉悟的工农。这种人，是危险的仇敌。”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终于坐不住了，一个个灰白着脸，偷偷地从会场上溜了出去。左派学生却在热烈鼓掌。萧楚女洪亮的声音，紧紧追上了正在逃去的一小撮坏家伙：

“屠杀，有什么用！工农有力量解放他们自己。未来是属于工农大众的！”

三月下旬起，政治阴云越积越重，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日益肆无忌惮，第一次大革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萧楚女忧愤交集，加上连日苦斗，肺病又一次复发，重进东山医院。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完全撕下了革命的伪装，一手制造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上海。紧接着，南方各省的新、老军阀，也按照蒋介石的信号，纷纷举起了屠刀。十五日凌晨，在广州的反动派，按照同蒋介石订立的密约，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上午十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达一千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总工会，铁路总工会等都被捣毁，大批革命志士壮烈牺牲在街头。

黄埔军校的一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气腾腾地冲进东山医院，搜寻萧楚女。

萧楚女刚吐过血，见到反革命分子涌进病房，就毅然仰起上身，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走在头里的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被这眼光一惊，退了两步，转身叫同伙动手。萧楚女看到敌人的卑怯，淡淡地笑了一下，从容地坐了起来。

敌人害怕萧楚女开口，因为他们知道萧楚女语言锋利，他一开口，就凭他们在场的这几名小喽罗谁也对付不了，因此慌忙把萧楚女推着急走。萧楚女又一连吐了几口血，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听到白云山上远远地响着罪恶的枪声，街上滚过隆隆的装甲车，他知道现在每一刻都有许多战友在壮烈牺牲，更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他想狠狠斥责敌人的反革命暴行，而几个孙文主义分子又拖又曳，使他喘气也发生困难。他想呼喊，也喊不出声。他猛吸了一口气，用了全身力气，终于喊出：“打倒蒋介石新军阀！”“中国革命成功万岁！”这声音凌云直上，久久地回荡在红花岗的上空。敌人吓坏了，慌忙拿起枪托和木棍，对萧楚女下了毒手……。

珠江在呜咽，南海在愤怒地咆哮。

伟大的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光荣牺牲了！这时他才三十一岁。

萧楚女以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那光辉的誓言：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一个人从生以后一直到死，都要做对人民有益的正大光明的事，虽然肉体死去，而精神是不灭的。”

(史 锋)

# 赞“穷棒子”精神

第二机床厂工人写作组

“穷棒子”精神，这是以王国藩同志为首的西铺村“穷棒子”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最近从《红旗》杂志上读到王国藩同志《保持和发扬“穷棒子”精神》一文，我们不禁又想起了这种精神。

“穷棒子”的特点是“穷”。一九五二年秋后，农业合作化的东风吹进了座落在河北省长峪山麓的西铺村，王国藩等二十三户贫农带头成立了王国藩合作社。那光景，可真是穷：种子少；车辆缺，社里连记账用的纸也买不起，只好用玉米棒子皮将就着代替。全社唯一的一头大牲畜，是由十几个驴股凑起来的“三条驴腿”。当时，许多人都瞧不起这个“穷棒子社”，有人甚至这样声称：“一帮吃救济粮、领救济寒衣的‘穷棒子’凑到一块了，早晚得穷散了。”

人穷志不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穷棒子”自有穷办法。缺米缺钱，大伙来凑；缺牛缺马，人背骡拉。在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里，他们组织起来到几十里外的山上去打柴，吃稀粥，住草棚，硬是凭赤手空拳为集体置办下了大量生产资料。芝麻开花节节高。“穷棒子社”不仅没散，相反地，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一直阔步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进。今天的西铺大队，即当年的王国藩合作社，已经拥有上百头大牲畜，十台拖拉机，二百七十多台（件）农业机械，过去的荒山秃岭也已经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大寨田。看，多么可贵的“穷棒子”精神呵！

俗话不是说“人穷志短”吗？这是懦夫的哲学，懒汉的哲学。共产党人的哲学与此完全相反。穷怕什么？革命者连死都不怕，还能怕穷吗？穷则思变。革命就是由“穷棒子”们干起来的。只要有了“穷棒子”精神，就能战胜人间的一切困难，创造出人间的一切奇迹。王国藩合作社是如此，我们的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当年毛主席在看到“穷棒子”社的材料时高兴地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不是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几万万“穷棒子”发扬了“穷棒子”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天的中国，尽管已经达到了初步繁荣富强，但还不能真正算富，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算是个穷国。要达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全国人民需要继续艰苦奋斗，要象西铺大队那样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即使是将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了，也仍然需要这样做。我们不仅应当坚持用“穷棒子”精神来教育本国的人民，也还应当用“穷棒子”精神去勉励和鼓舞各国的战友。“穷棒子”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永远不能丢！

不谋私利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在刑场上唱道：“无产者奋斗一生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这既是革命者的自我写照，也是对革命者所提出的要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在对待自己的个人生活上，无产者历来以穷为乐，以穷为荣，不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相反地，倒是“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造成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巨，今天仅只是在万里长征路上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认为“穷棒子”精神现在已经过时了，可以在革命的长征路上停下脚步来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那实质上是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在这一点上，遵化县委为我们树立了革命的榜样。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中，由县委作出决定，规定全县干部从县委常委起，坚决做到“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不听”。这个决定做得好。它不仅继续保持了“穷棒子”精神，而且使“穷棒子”精神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得到了新的发扬。

这样做不是很苦吗？但舒舒服服又怎能干革命呢！如果连“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能算是个革命者么！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一点，那些害怕过艰苦生活的同志难道不觉得脸红吗？再说，苦和甜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苦，又哪来的甜？我们今天的甜，是革命前辈们吃尽了千辛万苦才换取得来的；为了中国人民子孙万代的甜，为了全世界“穷棒子”们的甜，我们吃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如若不信，你去问西铺村的“穷棒子”们吧！当他们在数九寒天里，缺衣少食地坚持在山上伐木砍柴的时候，当他们在烈日酷暑下，汗流浹背地开垦山坡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难道就是个“苦”字吗？不，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山河重新经过安排后的西铺村，想到的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作出贡献。他们为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而感到鼓舞，心中很甜很甜，甜滋滋地，甜得很！其实，又岂只是西铺村的“穷棒子”们是这样，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穷棒子”们都是这样的呵！

啊，“穷棒子”精神！多么崇高的精神！它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象征。我们将千百遍地赞美它，歌颂它，世世代代地把它保持和发扬下去。

# 做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评《杜鹃山》中雷刚的一枪

君 葳

京剧《杜鹃山》的第八场，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亲手击毙了叛徒、内奸温其久，这一枪凝聚着对敌人的憎恨和对自己的错误的痛悔。它不仅意味着雷刚与温其久的决裂，也意味着他与旧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决裂。

这一枪打得好，但这一枪是不容易打出的。雷刚的打出这一枪，就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雷刚本是一个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的贫苦雇农，对地主豪绅怀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这是他从身受的阶级压迫中得出的结论。秋收起义一声春雷，震动了杜鹃山。雷刚对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心驰神往，于是就“比着葫芦画个瓢，学着样子往前闯”，在杜鹃山扯旗造反，点燃了革命的烈火。

要革命，要造反，找不到党就“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雷刚的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十分强烈的。这也正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宝贵的阶级品格。但是小生产的狭隘眼限制着这个苦大仇深的雇农。他要革命，却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他渴望党来引路，但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党，更不理解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他的狭隘的复仇思想，使他只看到眼前的杜鹃山，只看到一个毒蛇胆，只想到他一家一户的苦难深仇，把革命仅仅理解成“仇报仇，冤报冤”，而把党的领导只理解成“领头带路把仇敌杀”。这种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复仇思想，如不加以克服，就势必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冲突。雷刚同柯湘之间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斗争首先是在“章程”问题上开始的。“章程”问题也就是路线和政策问题。雷刚分不清敌我友，凭着他那套“老章程”，是俘虏就杀，见商人就抓，甚至错误地请自己的阶级兄弟吃“革命的扁担”。这实际上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农民自卫队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原因即在于此。

雷刚与机会主义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他搞那套“老章程”是由于他缺乏觉悟。在田大江的问题上，当柯湘满怀着阶级深情，抚着田大江的条条伤痕，对雷刚说：“怎忍心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这句话深深地打动着雷刚的心灵，对雷刚进行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和路线的教育。“受苦人，肩上压的都是豪绅。”这是雷刚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折。他一旦醒悟过来，马上勇于承认错误，悔恨交加地扔掉扁担，抱住了田大江。真诚、坦率、不怕丢面子，

知道错了就改,这是雷刚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可爱之处。

世界观的转变,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斗争过程。雷刚在扁担事件后爽朗地说:“听党代表的!”这句话是真诚的。但是,当农民自卫军上山整训,遵循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方针,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的时候,雷刚的狭隘的复仇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又冒头了。而温其久也就利用他的思想弱点乘虚而入。“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治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这明明是恶意的挑拨,可是雷刚听了却猛受刺激。这仅仅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旧观念的问题吗?不是的。雷刚是崇敬柯湘的,但是他还不懂得,他与柯湘之间的关系,不单是同志和战友,还有一层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雷刚由于小生产所固有的那种分散性和狭隘性,不能正确认识个人与党的关系,缺乏党的观念和组织观念。而后者正是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战士的重要标志。

雷刚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他忘了杜鹃山。他还不懂得,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道理,不懂得一个无产者必须为整个阶级、为广大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身。脑子里只想着杜鹃山这个山头,是担负不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请看柯湘,“党的嘱托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这才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的精神境界。雷刚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境界,把个人恩怨看得很重,用江湖义气代替阶级情谊,是非不分,好坏不辨,听信了温其久的挑拨离间。柯湘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他却认为这是由于柯湘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才会阻拦他下山救杜妈妈。雷刚要救杜妈妈,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顾大局,把个人的恩怨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甚至不听党的指挥,不接受党的领导,这就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了。他一意孤行的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遭致了田大江的牺牲。如果不是柯湘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杜鹃山必将重蹈“旗竖旗倒,人聚人亡”的覆辙。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使是象雷刚那样强烈要求革命的雇农,要真正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必然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包括付出沉重的代价。雷刚感叹“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难正难在他本人的世界观的转变上。温其久的叛变,战友的牺牲,特别是经过柯湘的耐心、细致而深入的教育,雷刚才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中醒悟过来。柯湘要雷刚思考:“为什么砸开的铁镣又戴上?”这个问题提得多么好啊!如果我们不彻底砸碎资本主义和千百年的私有制所加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铁镣,不“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那末,被砸开的铁镣是很可能要重新戴上的。

雷刚虽然犯了种种错误,但一当他认识错误后,面对着无耻的叛徒,他坚决而果敢地打出了那一枪。这一枪标志着雷刚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只有下决心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裂,才能牢固地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这一枪是不是意味着雷刚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此到头了呢?当然不是。对雷刚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决不是终点。新的斗争和新的考验还正在等待着他。一个革命战士只有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跟上革命的前进的步伐。这正是雷刚的一枪所给予我们的深刻的启示。



#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范 中 柳

七月二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登载了孔宪凤父母教育子女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它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做父母？

象孔宪凤这样的工人家庭，在上海是大量的。有的家长常常这样说：“我们是工人家庭，孩子总归是工人阶级的后代！”这话未免说得太绝对了。试看《海港》中的韩小强，他就自以为是“码头工人的后代，红旗下长大”；但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险些上了钱守维的圈套。工人家庭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工人的后代只能是锻炼红、改造红，而不可能是自来红。特别是当自己的孩子受了大大小小的钱守维影响的时候，对做父母的可以说是一个考验。孔宪凤的父母说，“我们不护短”。“不护短”这三个字多有光彩啊！他们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立场出发，主动配合里弄干部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相形之下，那些对子女做了坏事还百般袒护的父母，该是觉得何等惭愧啊！

其实，当子女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当严格检查一下自己，看看为孩子做出了好样子没有？我们应当批判“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为封建纲常服务的儒家黑货。今天做父母的，都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这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本色。事实证明，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培养不出革命的后代。有些做父母的常说：“咱们小时候苦水喝够了，现在得让孩子们享点福了。”这种说法很不妥当。暖房里培养不出挺拔的劲松，我们决不能只从物质上关心子女。孔宪凤小时候，有一次看到同学穿着讲究，便要求妈妈再给她做两件新衣裳。但她妈妈用自己的苦难童年与她的今天作了比较，教育她说：“千万不能忘本啊！条件越是好，越是要艰苦奋斗！”对啊，咱们工人的下一代就是不能忘本嘛！要下一代不忘本，首先得咱们自己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孩子是谁的？各个阶级有不同的认识。封建地主阶级强调“人之伦，父子恩”，而下一代则应当“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荣宗耀祖；资产阶级把下一代当成商品，用金钱去换取所谓感情，以满足自己的自私需要。总之，他们都把子女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喜则溺爱，怒则打骂，一切以自己的喜恶为转移，就象鲁迅所揭露的那样，完全从“交换关系利害关系”出发。但在无产阶级看来，孩子并不属于父母个人，而是应当属于阶级，属于党。因此，就必须强调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进行对子女的教育。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希望同志们都能认真地想一想。

# “礼多人不怪”吗？

文 波

“礼多人不怪”，几千年来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但这句话其实颇成问题。

礼的原义，是指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它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一整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那个时候，人分几等，衣分几色，各自表明一定的阶级地位和等级。比如：皇帝穿的是黄袍，大官穿红袍，小官穿蓝袍，没有功名的秀才穿白衣，而劳动人民就只准穿皂衣。又如彼此相见，叩头请安，打拱作揖，也都有一套繁文缛节的规定。如果逾越这套规范，就会被视作“缺礼”、“少礼”或“无礼”，岂但要受大人先生们的责怪，轻则挨板子，重则可能杀头、坐牢。所谓“礼多人不怪”，其源盖出于此。

在旧时代，礼节和礼物紧密相连，什么“财礼”啊，“彩礼”啊，种种名目，不一而足。单说拜访上司，就得先送上一笔贽见礼。如果两手空空，一囊如洗，就会被视作“失礼”而拒之门外。总之，“礼”不仅应“多”，而且应“重”、应“厚”。礼厚人情厚，礼薄人情薄。正因如此，礼又成了剥削阶级用以榨取下属和人民的一种手段。今天老爷升官，明天太太做寿，后天小少爷满月，没完没了。所谓“礼多”，实质上也就是敲竹杠的名目繁多。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某县太爷做寿，事先放风声说自己是属鼠的，下属拼凑出钱铸了一只金鼠送他。谁知他刚一收下金鼠，立即扬言：“后天是我太太生日，她可是个属牛的！”剥削者的欲壑难填，于此可见一斑。民谚说：“人情逼如债”。这里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愤懑！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风尚开始代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旧风尚。在毛主席教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崇尚洁白朴素的生活，鄙弃那种礼尚往来的庸俗作风。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至今仍动辄以礼物开路的，却也大有人在。某些人把商品交换的原则搬到政治生活中来，动辄来个“礼多人不怪”，或者是捧场喝采、逢迎拍马，或者是大包小裹、烟酒搭桥，接踵而来的便是“照顾、照顾”、“帮帮忙”。而革命队伍中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上了圈套以后，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这个“好商量”，那个“好安排”，甚至违反革命利益也在所不计。

资产阶级历来讲究“将本求利”、“一本万利”。礼者，本也，钓饵也。讲“礼”是为了“得利”，礼多是为了利多。而无产阶级恰正相反。同志之间，有喜事表示祝贺，有丧事表示悼念，对家属进行慰问，患疾病进行探望，感情纯朴，语言真挚，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情应酬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使是送礼物吧，如人民群众向子弟兵送茶送水，向知识青年送树苗、良种，其中体现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决非寻常的金钱、礼物所能估量其价值。如果动辄送礼，你来我往，甚至计较礼厚礼薄，那就未免带有现金交易的“痕迹”了。

末了，补充一点：礼多必诈。因此，我们应当用“礼多人必怪”来代替“礼多人不怪”。

# 也谈“份内、份外”

唐 戡 国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六期刊登的《份内、份外》一文，说的是上海某食品店替回族同胞着想，在商店的墙上贴了一张回民饭馆的分布图，作者热情赞扬：“我们的革命职工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他们越出了本份，拆掉了份内、份外之间的这堵高墙。”文章的末尾问道：“你对革命的份外事是如何看待的呢？”

平时对“份内、份外”的问题没去想它。一读这篇文章，又被作者一追问，想了一想，倒有些想法了。

一般地说，职业不同，反映了社会分工不同，一个人从事某项职业，于是就出现了所说的“份内、份外”的问题，即所谓“份内、份外”，这是一道界限，对某些人来说是同高墙一样地隔绝着的。份内事有责任，有报酬，份外事没责任，也没报酬”。然而这样说来，似乎人们对“份外事”一定做得很少或干脆不做，而对于被这堵高墙包围着的“份内事”，大概都负责、积极、做得出色的了。对照实际生活，发现并非如此。因职业不同而形成的这堵“份内、份外”的所谓“高墙”，只不过是纸壁蒿墙，限制不了人们的活动。真实情况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干着不少“份外事”；人们对“份内事”和“份外事”也有着自己根本不同的理解。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都看作是他份内应该做的。

而有的人却干工作象条虫，干私活象条龙。他口头上说“我只管三分三——一本份”，其实却连“三分二”也未必就达到。发展严重的更是利用职权或工作的方便，不择手段地大干“份外事”以谋取私利。在这种人的头脑里，唯利是图成了“份内事”，为人民干革命却成了“份外事”。

为公还是为私，为人民还是为自己，构成不同人们不同“本份”，成为“份内事”和“份外事”的不同标准，形成一条界限。这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伟大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虽然有分工的不同，但不存在“革命的份外事”，一切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本职工作是一定要尽力做好的，这是为革命承担的基本义务，是“份中之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刻也不应该忘记。

末了，也想问一句，你是怎样看待“本份”的呢？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 创造奇迹的人们

——记金山工地的日日夜夜

金 盛 曦

山在欢腾，海在欢笑。金山工地，激荡着革命的战斗豪情。

日日夜夜，工地沸腾着。清晨，当太阳刚跃出海面，金色的天空中还闪烁着尚未隐去的星星，早班的工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战斗。深夜，四周万籁俱寂。可工地上，到处灯光如昼，焊花飞舞，机器的鸣响和劳动的欢声交织一片。数万名来自各方的建设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以大庆工人为榜样，正在这江海相连、纵横百里的土地上，谱写着—首社会主义的壮丽颂歌。

真的，谁会想到呢？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海滩。而今，却象神话一样，一道长八公里、高六米多的大堤已经修造起来了。在近万亩的厂区内，建筑成群，塔罐林立。一座座大烟囱，象巨人一样，耸峙入云。数十座大油罐、各种各样的反应塔，身披坚甲，巍然矗立。成排的厂房、住宅，象雨后春笋，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冒出来了。去年一年，工地上完成的基建投资额，比上海过去建成的最大的基建工程投资总额还要多得多。而今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仅上半年完成的工作量，又比去年全年完成的还多百分之三十。这不是奇迹吗？是的，这是罕见的人间奇迹。人民群众一旦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为指导，就会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呵！

一心干社会主义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加砖添瓦，是很大的幸福。”人们在谈到金山工程时，总是怀着一种出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在金山工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社会主义的壮丽图画。这里正在兴建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一个包括从炼油到化工，从化纤到塑料，从电厂到水厂，从机修到污水处理厂等十来个大型工厂的联合企业。仅第一期工程完成后生产出来的化学纤维——涤纶、腈纶、维纶，如果织成各种化纤织物，每年可以供应全国每人约二尺半。

这还不是这个工程的全部画面：

在厂区西南，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准备修造的“东方大港”附近，要建造一座能停泊万吨级油轮的外海岛式码头；

在厂区以西，要建造一条长达四十多公里的铁路支线，其中包括在黄浦江上，架起一座连引桥在内长三公里多的铁路、公路双层结构的浦江大桥；

在厂区内，还要建造几十万平方米的住宅以及商店、学校、托儿所、医院、文化宫、体育场等一整套文化生活设施。这就是说，要在这过去的海滩上，平地矗立起一座新兴的石油化工城。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石油化工工业的一项工程，它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亲切关怀。文化大革命前，不要说上海，就是在全国也很少有这样的大工程。但现在，这不过是我国目前正在兴建的许多巨大工程中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看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祖国这一片繁荣兴旺景象，这怎能不叫人万分喜悦和激动呢？

从金山工地向北，隔着一条马路，就是金山的老城。三十多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就是从这里窜上岸来的。直到现在，在金山老城里保存着的吊人树、杀人塘，就记载着金山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记载着过去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迹斑斑的历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苦难生活。解放以后，金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越走越欢，越过越美。现在，又要在这块过去浸透了人民血泪的土地上，兴建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工程，抚今思昔，瞻望前景，怎能不使人心潮起伏，感情激动呢？当各路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汇集金山海滩的时候，许多同志到金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金山老城里，参观金山人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历史陈迹。他们在阶级教育碑前，在蓬蓬勃勃的工地上，愤怒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控诉林彪“克己复礼”的罪行，把工地变成批林批孔的战场。今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人们联想到金山工地的现在和过去，更进一步懂得，要使过去的苦日子不再重现，就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江山保得牢牢的，不停顿地去铲除资本主义的旧基地，消除得越彻底越好。在工地上，许多干部、青年、老师傅，起早带晚，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写心得笔记，钻研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管工程怎样紧张繁忙，许多施工单位仍旧坚持举办学习班，开学习经验交流会、批判会。他们不仅决心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金山工程的建设，而且要把它办成反修防修的战斗堡垒。他们说：“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使不完的劲。”

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找到一把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吗？那些日日夜夜战斗在工地

上的英雄们,为什么始终会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目标紧紧地联系起来。每挑一担土,砌一段墙,焊一道接缝,或是吊装一件设备,他们都看作是射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炮弹,看作是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而增砖添瓦。

## 要有那么一股劲

干社会主义,就是要有那么一股劲。这股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金山工地,正是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激励着人们,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夺取着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金山工程,是一场不寻常的战斗。在“潮来浪滔滔,潮退水汪汪”的海滩上,平地建设起一座城市,该有多大的工作量啊!仅厂房等建筑面积就有一百四十万平方米,光地上地下埋设的各种平行管道有一千二百多公里长,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的土方工程,还有那么多的设备需要安装了。有人算了一笔账,仅上海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承担的安装工作量,就比它现有的生产能力大一倍以上。工程这样大,项目那样多,技术要求那么高,而这一切,又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上海基建部门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敢不敢打过去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高速度地拿下这个工程?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有人怀疑:“按预定时间完成,行吗?”也有人断言:“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可是,工人们一旦认清了工程的意义,把工程进度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时间要求快,没有我们社会主义列车的车轮转得快,工程规模大,不如工人的干劲大,技术要求高,抵不上我们的志气高。中国人民是说到做到的!”

围海筑堤,是工地建设的第一仗。这个艰巨的任务主要是由金山、平湖两县的五万贫下中农和城建、交运、打桩工人担任的。海滩没有一块干土,没有一处地方可以避风雨。为了抢在春潮前面,他们没有搭一处临时设施,吃在大堤上,睡在沿海贫下中农的家里。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北风呼号,雨雪连绵,给施工带来极大困难。可是,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说:“北风怕什么,当它电风扇;雨雪算什么,当它茶泡饭。”他们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战风雪,斗严寒。雨雪以后,海滩上一片泥泞,挑着一百多斤的土,一脚踩下去,陷到小腿肚,每跨一步,都要花很大力气。有些贫下中农干脆甩掉套鞋,赤着双脚,踏着薄冰,硬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土运到大堤上。手冻肿了,脚冻裂了,没有人叫一声苦。他们只用三十二天时间,就把一条小堤和一条大堤的一百二十万土方工程完成了,为建设金山工程立下了第一功。

有人写过一首诗:“寒冬腊月战金山,大雪盖地三尺三,月亮星星都怕冷,我们汗流湿衣衫。”这是对工地上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广大工程建设者们战天斗地、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赞歌。

金山工程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歼灭战，速决战。要打赢这场没有打过的大仗，就要有敢打必胜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腈纶北纺丝车间的一仗，就是一场“开足马力”的战斗。

腈纶厂，是工地上有名的争气厂。因为某种客观上的原因，工期拖后了四个月。工人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抢上去，让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看看。”

北纺丝车间的总面积有三万四千多平方米。为了把被拖延的时间抢回来，要求在四十五天内把这个车间的土建任务拿下来。

工地上，机械施工工人和土建工人，展开了接力赛。大小十几部吊车犹如蛟龙入海，几十吨的屋架，一椽一椽地腾空而起。经过十三昼夜的连续作战，他们就把五千多件、重一万三千多吨的混凝土构件吊装完毕，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天。一〇四工程队等单位的同志们，在吊装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进入现场；砌墙的、扎钢筋的、浇混凝土的，各个工种的工人，在“决不让社会主义列车在我们这里误点”的口号下，一环扣一环，你追我赶。日日夜夜，许多人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可是他们说：“宁可身上脱层皮，决不让工期向后移，宁可落掉一身膘，决不让工程拖分秒。”工地上一日数变，大车间一个劲地往上长，甚至早班上工的工人在晚上回去时，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原来上班走的路已被新的建筑挡住了。人们只用了四十天时间，就把这个大车间攻下来了。想想看，四十天完成三万四千平方米，这是多快的速度啊！

在金山工地，这种为了革命事业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思想正在成长。去年十月间，一〇五工程队女子油漆班的全体团员，在学习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光辉著作后，提出了一个用义务劳动开展增产节约的倡议。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坚持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抵制党在腐朽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受的影响的需要。这个倡议，不仅在团员青年中，而且在工地的广大群众中迅速展开来。

我们听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同志，他们成日成夜地在工地上劳动，早班连中班，中班连夜班，为了完成某项突击任务，甚至二十小时、三十小时地不下火线。当领导劝他们休息时，他们总是说：“工作还没做完，我怎么睡得着呢？”有些同志则说自己上的是“革命班”，不论白天黑夜，哪里需要就战斗在那里。领导上为了照顾同志们休息，给他们发了调休单。可是，他们把调休单退回去，说：“我们不要调休，要的是反修防修。”人们在劳动中不仅为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绩，而且也把自己的思想不断提到了新的高度。

列宁在论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意义时，把它称之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在金山工地，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光辉照耀下，这种共产主义的幼芽，不是正在突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而茁壮地成长着吗？

## 干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水平

“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在金山工地，不仅有许多艰巨繁重的任务需要人们去完成，而且还有许多“第一次实践”的新课题摆在人们面前。勇敢的建设者们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一百五十米的大烟囱，上海从来没有造过。如果沿用过去的老工艺，光搭个脚手架，就得花四个月时间，工程等不及。怎么办？一〇七工程队的工人和干部，决心采用无井架滑模液压顶升新工艺，为我国高空建筑闯出一条新路。

去年六月四日，烟囱上升到一百零三米。班长唐玉龙带领全班战士正在紧张施工。突然，天气骤变，狂风把烟囱上的旗帜扯得粉碎，刮得人睁不开眼，立不稳脚，乌云挟着风势，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按照规定，为了保证工人安全，一下雷阵雨，就要下来避雷。施工组从下面打来紧急电话，要他们立即停止施工！但是，唐玉龙看了看平台上的二百多公斤混凝土还没有浇完，“就这样撒手下去吗？”同志们齐声说：“不，我们要抓紧雷雨前的分秒时间，把它浇捣完再离开现场！”

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同志们一股劲地猛干。忽然，一阵雷响把平台上的钢筋打得火星直冒，暴雨倾盆而下，指挥部领导同志也赶到现场，关心地要他们马上下来。但是，上面的同志想到，暴风雨中如果立即停止作业，会给工程质量带来后患，“宁可自己担风险，不让工程出危险”，他们背诵着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继续坚持施工，同时拖着做好保证质量的措施。这时，又是一阵惊雷，金山变电所电源被击断了。没有电，烟囱上下的吊梯不好开动，同志们就无法下来。人们焦急地望着烟囱顶，关心着顶上二十七位同志的安全。可是，烟囱顶上的同志，脸不变色心不跳，坚持把混凝土浇捣完毕，才从容不迫地撤离现场。他们勇敢、沉着地，一个扶着一个，从百米高空，沿着烟囱外面的消防扶梯鱼贯而下。雨一停，二十七位同志又立即上去战斗了。这一班，他们提前两小时完成了任务，把雷雨中失去的时间也抢了回来。

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呵！我们能不为金山工地上这些祖国的英雄儿女感到自豪吗？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面前，还有什么新路不敢去闯，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高峰不能攀登呢？大烟囱随着人们思想的高度不断升高。他们终于以七十四天的顽强战斗，就完成了筒壁的浇筑任务，把红旗插上了一百五十米的高空。在战斗过程中，一百多位工人个个不安全事故，没有出一件重大的人身事故。经过测量，一百五十米高的烟囱上下倾斜度只有四公分，比规定允许偏差十五公分少了四分之三，为我国高空建筑施工干出了新水平。

在金山工地，建筑工人们上天入地，无所畏惧。他们不仅登上了高空建筑的高峰，而且为海底隧道工程创造了我国隧道工程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建筑污水处理厂，需要在海底四米以下造一条直径二米九的隧道出水口。历来的施



工方法，都是采用筑岛沉井法，不仅投资很大，而且周期很长，势必要影响到整个工程的建设进度。

隧道工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革命的大胆设想：既然能叫盾构朝下钻洞千米，横钻几十里，为什么不能让它从海底下钻出海面呢？

这个设想在会上一提出来，立即象炸开了油锅，大家议论纷纷。虽然，人们都承认这个设想好，是个创举，符合多快好省！但是，很多人却一个劲地摇头。他们认为，塌方、流沙是地下施工的大敌，现在要在自己头顶上打开个大洞，万一潮水冲动海底土壤，发生海水倒灌，就会造成重大事故。他们说：“这个办法危险太大，行不通。”也有的说：“这种施工方法过去文献中没有看到过，不能冒险。”但工人们说：“国际上没有的先例，我们创！文献上没有记载的，我们写！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办到。”他们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整个设想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计算。经过几个月的争论，终于说服了那些反对的同志，把方案确定下来了。

谁第一批下去？这在担任施工任务的隧道一大队倒成了个难题。工人们纷纷要求参加第一批：“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第一批下去。”“我是共青团员，应该在这次斗争中接受考验。”……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最后党支部确定了十九位同志，由支部书记和施工队长带队。公司党委副书记也带了两个干部下井和工人一起战斗。

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正当第三个井管破土出海的时候，突然发现西北角有泥浆霹雳拍啦地往下窜。翟宝海喊了声：“上面漏水！”当班组长汤四弟等几个同志马上冲到洞口堵漏，但漏水的洞口被角钢挡住了。“马上割开，焊！”机修工陈宏伟抢过焊枪就上！可是，海水冲进来的压力过大，焊不住。水越漏越急，象打开的自来水龙头那样喷射出来。不能堵，又不能焊，怎么办？工人们马上在现场召开了“诸葛亮会”。当时正在退潮。他们想：如果争取时间，把漏水的地方索性顶出水面，就可以化险为安。他们当机立断：“继续顶！”水哗哗地流着，象下着大雨，把人们的衣裳全打湿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工人们毫无畏惧，继续施工，和海水争分夺秒。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海水不停地流进来，但是，我们英雄的隧道工人比海水跑得更快，经过近一小时的战斗，他们终于把漏水的地方顶出海面，险象解除了。

现在，这个被人们称之为“打开隧道天灵盖，征服龙王显神威”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在金山工地，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成就不断涌现。我们时常听到人们介绍说：“这是第一次……”。这些第一次的成就，第一次的创造，是那么激动人心。人们正是把这种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使金山工程不断赢得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的进展。

### 革命智慧能胜天

在工地上，我们曾看到一只已经残破了的小铁船，说它是船，其实不过是用铁皮敲成

象船样的东西罢了。工地上的同志说：“别小看了这小铁船，它可是作了大贡献哩。应该把它保存起来，将来放到厂史陈列室去。”

他讲的，就是建厂初期工地上闻名的“陆地行舟”的故事。那时，海滩上水汪汪一片，要筑堤首先得把几万吨的石块和几十万只装满泥的草包运到筑堤线上去。用卡车装，开一段路就陷进泥里去了；从海上用船抛，水浅又到不了筑堤线。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建设者们，却把车和船这样一对矛盾的东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拖拉机拉着小铁船在海滩上“飞跑”，一下子就把这个拦路虎打败了。

想想吧，在短期内要建设这样一个大工程，前进途中该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呵！但是，在金山工地上，人们引为自豪的是，困难没有成为前进的阻力，反而成为激励人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动力。人们正是从困难中，看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潜力，磨炼了革命意志，增长了革命才干。

还是说运输吧，那么多的物资、设备、器材，需要多少车船来装呵！但是，困难还不仅在于那么大的运输量，去年下半年，就有二百五十多件“超高、超重、超大”的大件设备要运进工地。在这批“超”字号的设备中，最长的近六十米，竖起来超过二十层楼；最“胖”的直径六米多，横下来比三个人还高，象个“小山丘”；最重的，有二百多吨，那真是个“大家伙”了。从公路走，桥梁要全部翻造加固，其他一切运输都要停下来，行不通；从海里走，海滩上没有码头，运不进；从河里走，航道浅窄，桥洞低，进不去，真难呵！

的确，如果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确实是很困难的。困难和群众见了面，办法就想出来了。谁呢？就是那些在旧社会里被资本家、包工头称为“排头”、“排花子”的扎排工人。正是这些过去被人们瞧不起的“卑贱者”，用古老的木排挑起了大件运输的重担。

木排怎么能载得起成百吨重的大件呢？但是，南市区和川沙县扎排队的工人们却硬是创造了这个人间的奇迹。扎排队里没有一个技术员，没有一个人会画图纸，可是，那些老扎排工人，凭着多年顶风踩浪的经验，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用石头在泥地上划，吃饭时，小伙子捧着饭碗，用筷子蘸着汤在桌子上划；白天在单位里商量，一到晚上，七个、八个的凑集在一起，在灯光下议论着。人多热气高，人多智慧多。只有三、四天时间，一百五十多个工人就画出了五十多种草图。有的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画的，有的是躺在病床上叫儿子帮助画的。各种各样的草图，每一张图上都凝结着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热忱，凝结着他们的革命激情。青年船老大张文良和其他两个老师傅一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把五十三种草图的优点集中起来，最后画出了一种箱形排的草图。为了取得实际经验，他们到竹行里，买了一千根筷子，扎出一个模型，并且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到通往金山的内河里，对每一顶桥的高度，每个河湾的水深、宽度，都进行了实地勘测，精心设计了能适应运输不同大件设备的各种木排，经过试航，最后把那最长、最“胖”的设备，一个个顺利地运到了工地。看，就是这个古老的木排，却把大件运输这个难关给攻破了。“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木

排这个古老的运输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人们自豪地称它们是：“水上大平板”。

大件设备顺利运到工地，还需要解决设备的安装问题。整个工程需要安装的设备有二十多万吨，许多设备的安装质量要求很高。就拿裂解炉框架的安装来说，这是一座由八百多根钢制的柱梁、撑架焊接拼装起来的“庞然大物”。二万多个接点，都用螺丝连结，安装质量要求很高。这座相当于七层楼高的“钢架楼房”，从底部到顶端，不能倾斜一公分。按照国外资料，要达到这个精确度，就得象盖房子那样，先搭好脚手架，然后竖柱架梁，拼装斜撑，由下向上一根根安装。用这种散装法，要花半年时间，如果采用平地片装一面，再竖起来合拢的片装法，虽然可以加快速度，但据某些人说：这只有失败的记录，没有成功的经验。

安装工人决心打破这个迷信。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分析散装所以能够保证精确度，是由于就地安装，不会变形；片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组装一面，拼接时容易变形。散和整是一对矛盾。如果索性打破常规，来个平地组装、整吊，不是既加快了速度，又可以保证精确度吗？

但是，能不能够保证在整体吊装过程中一点都不变形呢？工人们又抓住这个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吊装中变形的原因是由于物体在运动中失去了平衡，产生了扭力。反之，如果在吊装时使它保持平衡，做到动中求稳，就不会变形了。他们想起过去在其他工地上吊装一种设备时，曾经用两根把杆，一根起吊，一根稳住，使吊件在空中垂直。现在，裂解炉框架同样可以采取这种组装整吊的办法。

整体吊装的那一天到了。大小两部吊车分立框架两边，一座庞大的“钢楼”凌空托起，在空中慢慢垂直以后，又稳稳落下，不偏不倚地套进了预埋在基础上的三十六个螺丝。一检验，偏差不到半公分，大大超过了设计要求。原来认为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九天就完成了。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在这里，不是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证明了吗？

##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金山工地的建设者，来自四面八方。这里有上海有关局、公司和工厂来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有从大庆、辽阳、武汉、贵州、河南、四川等地前来支援的建设队伍；有贫下中农、解放军，也有街道里弄的支援工和老当益壮的退休工人，有商业工作者，也有医务工作者。他们很多素不相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早日把金山工程建设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在工地上，共产主义风格不断发扬，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先人后己、团结协

作的故事，真是说也说不完。这里我们只想讲一个工地食堂的故事。

这是七〇四工程队的一个食堂。食堂的五十多位工作人员，除几位老师傅是本队的，其他有川沙、南汇的贫下中农，有眉州、龙江街道的支援工，也有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虽然做的是后勤工作，可是人们却称赞他们是“后勤不后”。他们的口号是：“热菜热饭热心肠，保证前方打胜仗。”他们的心是和前方工人的心跳动在一起的。

最初，这个食堂办得不算太好。有一次天热的时候，几个炊事员到工地上送茶水。当他们送完了最后一桶茶水回来经过第一个供应点时，几个炊事员怔住了：一大桶开水已经给工人喝完了。炊事员的心情立即象烧开了的锅那样翻腾起来：这里喝掉了多少水，就是前方工人流掉多少汗呵！回来后，食堂里议论开了：我们应该怎样以流大汗的精神为前方流大汗的工人服务呢？这时，公司党委副书记也经常到食堂来参加劳动，和他们讲清搞好食堂工作的道理，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从此，他们起早带晚，不怕苦，不怕累，千方百计为前方服务。在涤纶厂主厂房会战的时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许多人连饭也顾不得吃。食堂工人知道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挑着饭菜，提着热汤，爬到二、三十米高的施工现场，把饭菜送到工人手里。在整整一个月里，他们不仅送三顿饭，上、下午和深夜还要送三次点心，一天要爬六、七次。他们又细心调查了工人喜欢的口味，做成花色多样的饭菜点心。碰到下雨天，他们不仅和领导干部一起，登上三十多米高的主厂房，把滚热的姜汤一杯杯送到工人手里，而且主动在食堂升起炉子，让工人下工后烘衣服。他们还经常到医务室去，发现哪位工人同志病了，就专门为他们烧病号伙食，开饭之前送到工人的床前。前方工人的干劲鼓舞了后方，后方工人的革命热情，也鼓舞着前方。当许多工人在工地现场接过那滚烫的姜汤的时候，他们激动地说：“后方工人和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定多打胜仗，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的确，金山工地上打的每一个大胜仗，不都包含着后方工人的这股“热心肠”吗？

这是多么可贵的热心肠呵！有了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情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拈轻怕重、互相扯皮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就会站不住脚，共产主义风格就会大大发扬，就能把前方和后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把“五湖四海”的人们都紧紧团结在一起。

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不仅把金山工地的几万建设者团结在一起，在工地外面，在上海和全国各地，还有几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在为金山工程流汗出力。金山工地的日日夜夜是和上海、全国各个战线的日日夜夜交织在一起，相互鼓舞，相互促进的，金山工地的每一个胜利，也是和全市、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金山工地需要十六锰铜钢。这种钢种上海从来没有炼过。上钢三厂立即成立了支援金山小组，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这种钢炼出来了。

金山建厂初期，工地上需要大量的物资器材。上海各行各业都动员起来，清仓查库，发扬先人后己的精神，把金山急需的物资器材，装了一百六十多部卡车，浩浩荡荡地送到了金山。

金山工地需要的空气冷却器，是由西安机械厂制造的。造好后由于当时铁路运输繁

忙,运不出来。陕西省建工局机施公司运输队知道后,虽然他们没有代运任务,可是却立即派出了四辆大卡车,由党支部书记亲自带队,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及时送到了工地。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浸透了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样的事情能够办到吗?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有力批判。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又使这种优越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建设金山工程的人们,把全国、全市人民的支援看成是对自己极大的关怀和鞭策,激励自己去多快好省地拿下这个大工程。他们一再表示自己的这种感激心情。

但是,人们也在感谢金山。有一次,上海建筑机械厂把他们为金山工程制造的两台起重机送到工地。当工程指挥部的同志向他们道谢时,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却说:“不是你们谢谢我们,是我们来谢谢你们!”这是客套吗?不,这位党委书记说的是心里话。这个厂去年八月份原计划生产十五台挖掘机,上级又布置他们为金山生产一些起重机,厂党委感到有困难。后来,他们利用星期天组织了二百多位工人到金山工地参观。工人群众在金山工地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仅完成了原订计划,而且为金山增产了两台起重机。九、十月份,他们把月产水平提高到二十台,同时还为金山增产了十台拉铲装置,创造了这个厂的月产历史最高纪录,全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怀有这种心情的,并不止一个上海建筑机械厂。各行各业在支援金山的过程中,同时也把自己的生产、工作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上海冶金、仪表、机电、化工、纺织、轻工、运输、建筑等行业,都在支援金山工程中创造了许多新纪录、新成绩,试制了大量的新产品,为国家填补了空白。金山工程在前进,上海各行各业也在前进,它们就象金山海面的波涛,相互激荡,滚滚向前。

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胜利。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金山工程还在紧张进行,人们正在“学理论、做主人、促生产”的口号下,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在大洋的彼岸,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一片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我们的社会主义却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两种制度两重天,这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呵!风景这边独好。我们怎能不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而感到欢欣鼓舞。让我们也象日日夜夜战斗在金山工地的人们一样,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英勇奋斗!

# 新 泾 一 年

去年,也是这时候,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发动群众修订了农业发展远景规划,现在又是一年了。这一年里,新泾大队在学大寨、抓路线、实施规划的征途上,又发生了些什么可喜的变化呢?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重访了新泾大队。

夏天,骄阳似火。新泾大队一千三百多亩早稻,长势喜人,一片葱绿。挺秀的棉苗,枝壮叶茂,分外可爱。农机干道两旁,去年以来种植的几千株白榆、水杉,而今已长得很高了。新平整的园田,沟沟相连,路路相通,从高处望去,犹如星罗棋布,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一年以来,这个大队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完成的土方有十二万多立方米,比实施规划的头一年增加了一倍多,平均每个整、半劳动力完成了一百六十多方。现在,全大队二千九百多亩集体耕地,除三百多亩高亢地外,都已重新作了安排,其中二千多亩已初步建设成为可以水旱轮作、旱涝保收的园田化农田。去年,这个大队的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九十六斤,比一九七三年又增加了一百二十六斤。今年的夏粮,在去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范家生产队的油菜籽,平均每亩达到三百斤,提前实现了七年规划规定的指标。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实现‘二、二、三’(粮食亩产二千斤,棉花亩产二百斤,油菜籽亩产三百斤)打响的第一炮!”

然而,更可喜的,还是广大贫下中农精神面貌的变化。修订规划一年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新泾贫下中农把实施远景规划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方向更明确了,眼界更开阔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更高了,干劲也更足了。

## 把规划印在自己的心坎上

一到新泾,我们就听到人们讲起这样一件事:

今年五月三十日傍晚,县气象站发出紧急通知:七时半左右将有暴风雨,要社员把收割下来的三麦、油菜,赶快堆起来。通知不久,狂风呼啸,雷电交加,乌云趁着风势,铺天盖地压过来,暴风雨来临了。在范家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老贫农范文彩和大家一起在抢堆油菜。这时,他女儿忽然跑来叫开了:

“阿爸,快回去!小菜地(自留地)里割下的麦子没有捆,要给风吹跑了。”

范文彩一听,冲着女儿喊起来:

“你讲啥呀？集体的油菜籽摊在这里，你不来相帮，反叫我回去？”他把手一挥，说：“小菜地里的麦子不要管它，快来帮助堆油菜！”

女儿被父亲一嚷，也立即想过来了。她二话没说，便高高兴兴地和阿爸一起，投入抢堆油菜籽的战斗了。

这一晚，在新泾大队，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证集体生产不受损失，汗水和雨水一起往下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想躲一躲。战斗在陆泾生产队仓库场上的几个青年社员，眼看盖在麦堆上的塑料薄膜快被风吹走，他们就用身体压在麦堆上。薄膜不够，有的社员急步奔回去，揭下自家麦堆上的“箬篁”，盖到集体的大堆上……。

新泾贫下中农热爱集体的社会主义觉悟，是在同小生产的自发倾向和习惯势力不断作斗争中树立起来的。新泾大队有的生产队靠近火车站，前两年，为了多赚钞票，不管农闲农忙，一听说要卸火车，有的社员把手上的农活丢下来就跑。有的社员热衷于上自由市场，“一只篮子一把秤，经常跑跑小集镇”。农业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使社员们进一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图景。特别是今年春天，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大队党支部根据规划，在领导社员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分三批举办了由全大队社员参加的理论学习班，每批四个晚上，从下午五时学到九时。学习班围绕两个专题进行了学习讨论：一是关于小生产的问题，一是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学习中，大家联系实际，批判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了工分挂帅等一套修正主义黑货，大大提高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越来越多的社员自觉地冲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今年三夏结束时，范家生产队按照过去的习惯，把集体的油菜籽壳分给社员垫猪圈积肥。社员范桂荣发现壳里还没有打净，他就一把一把地复打，结果打出了四斤油菜籽。怎么办？是交给集体还是留归自己呢？范桂荣想：油菜籽壳虽然已分给社员个人支配，但复打出来的油菜籽，是集体财产，应该交给集体。如果留下来，把集体的东西占归己有，这不仍旧是在小生产的个人利益里兜圈子吗？于是，他叫老伴把四斤油菜籽交给了仓库保管员。范桂荣一心为集体的先进思想受到社员们的赞扬，大家都向他学习，把分到的油菜籽壳进行了复打，一共打出六十多斤油菜籽，全部交给了生产队。

“不做工分的奴隶，要做公社的主人。”这是广大社员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后提出的口号。今年三夏战斗中，定额计分那一套东西不搞了，而人们“各尽所能”、当家作主的精神却得到了发扬。一天凌晨三时，当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陆家生产队的秧田里，传出了一阵阵拔秧的声响，是谁这样早就在干活呢？这是顾月萍等五位青年女社员。她们看到插秧季节紧，自动起早来拔秧，进行“不计报酬”的劳动。汤家生产队有十多位青年，在开完夜工以后，已是九点多钟，他们并没有回家休息，却拿起镰刀，自动跑到地里去抢收麦子。在广大社员中，有谁看到种稻的田块里哪里低了，就主动说：“我来挑几担上去。”为了严格按质量标准插秧，社员们会自觉地找来其他社员，说：“帮我来看看，符合不符合标准？”有的生产队，过去出工要到社员门上去叫，现在反过来，到了收工时间，社员

们还是在一股劲地干活，要队长几次催促，大家才回去休息。这些看上去都是些小事情，可是，从这些小事情上，不是可以看到新泾大队修订规划一年来，社员们不断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的矫健步伐吗？这不是实施规划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吗？新泾贫下中农不仅把远景规划写在纸上，画在墙壁上，而且深深印在自己的心坎上。

##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要把心上的规划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啊！

去年三秋，由于季节推迟，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不误农时，按时、按质、按量地搞好收种管，又要抓紧时间，按照规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对新泾这样一个田多劳力少、一年三熟的大队来说，困难该有多大！加之阴雨连绵，泥头又粘又烂，拖拉机用不上，更增加了劳力的紧张。但是，困难再大，没有新泾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决心大。社员们说得好：“不怕坏天气，只怕没志气；不怕泥头烂，只要加油干！”他们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坚持人定胜天，大干大变。

陆家生产队的顾浦滩，是新泾大队一片有名的高亢地，共有二十四亩，“土堆象小山，高低四尺三”，历来是只能种旱粮，不能种水稻的贫瘠地。过去，这个队的干部和社员，早就想改造顾浦滩，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因为工作量大，一直下不了决心。这次，这个队的广大社员，在修订远景规划的鼓舞下，为了加速建设水旱轮作、旱涝保收的园田化农田，决心“向顾浦滩宣战，向高亢地要粮”。他们白天战三秋，晚上搞平整。但是，有人担心，这样下去，弄不好会象翘梢扁担搁在石头上——两头落空。也有的说：等平整好土地再种麦子，连麦柴加在一起也收不到二百斤，主张荒掉一熟算了，平整土地可以放在农闲时慢慢来。可是，广大社员认为，三秋三夏中搞农田基本建设，就是为了抓紧两熟之间的大忙季节，把收种管与农田基本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为今后的高产稳产打基础，又能确保三季熟熟丰收，做到当年受益。如果把农田基本建设推到农闲去，就会耽误一熟，影响当年生产，这不符合农业大干快上的精神。他们豪迈地说：“跨上马背就要向前奔”，“宁可脱掉几斤肉，决不让规划脱一条”。

深秋的夜晚，格外寂静，但在顾浦滩上，却是灯火通明，一片喧腾。灯光下，铁锹飞舞，人流不息。女社员用劲地挖着土，男社员扛着箩筐来回飞奔。铁镢歪弯了，敲直了再歪；杠棒扛断了，换一根再扛。拖拉机的轰鸣和“吭唷、吭唷”的号子声交融在一起，汇合成一曲战天斗地的凯歌。经过八个夜晚的苦战，终于征服了顾浦滩。新泾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是以这种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在去年三秋当中，战胜了恶劣的气候条件，不仅胜利完成了收种管的任务，而且完成了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三万一千土方，使一千六百多亩土地初步成为园田化农田。今年夏收，顾浦滩上那片麦子的亩产达到了四百多斤。如今，清清的渠水第一次流进了顾浦滩，这块原来高低不平的高亢地上，第一次种上了水稻，苗



壮的稻苗在渠水的浇灌下日日夜长。

新泾大队的贫下中农，这样大干苦干，忘我劳动，难道就一点不觉得“累”、不觉得“苦”吗？就拿今年三夏来说，除收、种、管的任务以外，需要平整的土地就有八百亩。这四项任务加在一起，一个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六、七亩，的确很辛苦。但是，什么叫苦？对于新泾大队的社员来说，是有深切体会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朱阿金说：“要说苦，旧社会里我们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才是真正的苦。过去，我为地主做长工，半夜咽，五更起，一年忙到年夜头，还是两只空拳头。现在，我们实施规划，干社会主义，为革命种田，再苦再累心也甜。”朱阿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在实施规划的战斗中，他白天养好猪，喂好牛，还为社员烧好开水送田头。夜里，他坚持要和社员一起开夜工，劝也劝不走。他说：“想想社会主义的前景，看看日日变化的新泾，我越想越高兴，越干越有劲。我虽然已经七十岁，也要为实现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作贡献。”

朱阿金的话代表了新泾大队广大贫下中农的共同心愿。他们划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苦乐观的界限，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大干苦干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我们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一根扁担两只手，干出一个新天地。今年春节前夕，已经完成县、社两级开河任务的新泾贫下中农，又迎来了开挖浦曲河的战斗。浦曲河，河狭水浅，干旱时底朝天，多雨时水汪汪，沿河两岸，经常受害。为了迅速改变这一带的生产条件，按照规划，决定在春节前开好这条河，既可改善水利，又可便利交通。但动工第一天，就下起大雨。要不要停下来？社员们说：“下雨，动摇不了我们大干的决心；路滑，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从头发花白的老人，到十四、五岁的学生，都投入了开河战斗。雨越下越大，人越战越欢。有的人滑倒了，爬起来再干；鞋子被烂泥陷住了，干脆赤脚干。正是开挖浦曲河的紧张时期，从别的大队嫁到新泾封家生产队的金桃英，被社员们冒雨开河的革命热情所深深感动。她想：我到了新泾，就要为实现新泾的远景规划出力。结婚第二天一早，她就换上了粗布衣裳，破四旧，立四新，拿了铁锹上河塘，参加了新泾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行列。浦曲河开了五天，连续阴雨。可是，天大雨，人大干，有的生产队夜里还挂起了“小太阳”。有一首顺口溜是这样写的：“冒雨上河塘，干群斗志昂，冷雨湿衣裳，热汗浑身淌，跌倒怕什么，迎着困难上。”连续五天五夜的战斗，他们终于战胜了天雨的难度，开挖了一条长三百米、宽十二米的河道，在春节前两天提前完成了任务。

“一队红红一点，队队红红一片。”新泾大队贫下中农冲破了小生产的“巴掌山”，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去年三秋，在搬老路、筑新路的战斗中，顾家生产队首先完成了任务，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许多社员因为连续作战，眼睛熬红了，肩膀挑肿了，可是，他们顾不得休息，却拿起铁锹，扛起箩筐，到兄弟队的工地上继续干起来了。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相互支援，生产上也相互帮助。去年，南巷生产队有二十多亩稻田里发现了“稻蓟马”虫害，队里立即出动机动喷雾器喷洒农药，可是机器刚“突、突、突”地响了几下，便哑了嘴，只好抬到大队农机修理站去。这一情景被邻近的陆泾生产队长李文扬看到了，他立即想用自己队里的喷雾器去支援他们。可是自己队里也有四亩稻子发生了这种

虫害,怎么办呢?他细细一想,觉得实现规划要全大队共同前进才行。四亩同二十亩比是个“卒”,二十亩同四亩比是个“车”,应该让南巷先打药水。他转身跑回队里,把这件事同植保员和其他社员说了,大家都认为“应该”,于是,植保员和另一个社员立即抬起喷雾器,跟着老李急匆匆地跑向南巷生产队去。

## 做实施规划的带头人

“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和汗,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泥和汗。”这是新泾大队广大社员对干部的热情赞扬。一年来,在实施规划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新泾大队的干部们,始终冲在第一线,哪里有困难,哪里最艰苦,那里就有干部。

今年,新泾大队埋设的地下渠有三千多米,比去年增加了一倍。经过修建队的全力奋战,克服了春寒、雨多、泥烂的困难,抢在早稻秧田落谷前埋好了。但是,试验放水的结果,有几处漏水,负责修建的党支部副书记、青年干部庄进德,立即召开了诸葛亮会议,分析原因,认为主要是因为埋地下渠时雨水多,涵洞接口处的水泥被雨水冲掉,这样就漏水了。怎么办?如果全开泥土重埋,时间来不及,会影响早稻落谷;如果从井口钻下去修补,操作十分困难,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庄进德想,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早稻落谷。他当机立断,决定和四个民兵一起,组成抢修班,从井口钻下去。

“同志们,我先下。”小庄带了手电筒、水泥和工具,第一个从井口钻了下去。

地下渠道直径只有六十公分到八十公分,仅容得一个人,里面一片漆黑,又闷、又热、又湿。小庄匍匐前进,衣服被渠水、汗水湿透了,手脚被水泥渠壁擦破了,可是他毫不在意,坚持细致查看,发现漏水的地方,就用黄沙、水泥堵塞、修补。他们越爬越深,渠内缺氧,呼吸困难,他们就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鼓励自己,坚持继续战斗。就这样,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他们在地下渠道内查遍了一千五百多只涵洞的接口,把有毛病的地方一一作了修补。渠道正式放水时,群众一片欢腾。碧清的渠水乖乖地流进了秧田,早稻秧苗比往年生长得更加葱绿、健壮。

象庄进德这样的干部,在新泾大队中又何止一个。在生产队干部中,就有档档都打社会主义大算盘、在实现规划中一马当先的顾家生产队队长顾桂荣;有胸怀全局、任劳任怨的南巷生产队政治队长沈志义;有朝气蓬勃、勇于挑重担、带领广大群众大干苦干的范家生产队二十一岁的青年女政治队长张妹琴;……大队干部中,党支部书记曹抗美、副书记施正强,更是坚持风里来、雨里去,白天做、黑夜干,和群众一起为实施规划而艰苦奋斗。

去年以来,新泾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在《红旗》杂志发表后,来队参观的人多了,上级鼓励、兄弟单位的赞扬也多了。能不能正确对待胜利和荣誉,这对新泾大队的干部来说,是能不能继续革命、继续带领群众前进的新问题。大队党支部根据规划第一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多次举办学习班,开门整风,克服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满”字、“松”字和“难”

字。今年二月初，他们还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发动社员群众逐条对照规划，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开门整风，不少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向后看，有进步；向前看，要跑步。”他们决心在成绩当中找差距，困难面前不停步。会上，他们还作出了“巩固北片，发展南片，加速农田基本建设步伐”的决定，大队干部纷纷要求到南片蹲点，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为实现远景规划，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新泾大队的干部，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根本的一条，在于大队党支部一班人，能够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觉改造世界观。大队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了理论学习中心组，每逢星期天集中学习半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大队召开了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作出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规划实施”的决议，把学习理论放到一切工作的首位。大队党支部书记曹抗美带头学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严格要求自己，做实施规划、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去年十一月，大队企业要增加人员，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推选曹抗美的妹妹去，小曹知道后认为：“自己是党支部书记，应该教育家属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搞好农业。”他召开了家庭会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全家人的支持，一致表示要立志务农，为实施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往往也要碰到一些干部家的宅基、竹园和自留地。怎样对待？是只顾个人利益还是从全局出发，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年二月，封家生产队的农机路经过测量、初步放样，要经过党支部委员陈云龙家的三分竹园地，有人建议让过几米，陈云龙的家属也主张这样做。老陈知道后，立即召开家庭会，与家属一起回忆对比，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他说：“我们不能被三分竹园地挡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现在砍掉了，调整后还可放新的嘛。”在家属的支持下，他拿起刀子，亲自动手，在三分竹园地的中间砍出了一条土路基。在干部实际行动的影响下，全大队有十二户人家为了加快农田基本建设步伐，自愿按照政策调整了宅基和竹园地。

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新泾大队又发生了多么可喜的变化！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林批孔的一年，是扬鞭跃马，大干快上的一年，也是新泾广大干部和社员继续经受锻炼，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一年。“好马上程蹄不停”。新泾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在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快马加鞭，投入新的战斗！

(本刊通讯员、记者)

##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编者按：**七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发表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毛主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我们一定要加深对《七·二一指示》的理解，坚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办好全日制大学的同时，努力办好工农业余大学，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胜利前进。

# 办好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

中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委员会

我们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是由同济大学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建筑学专业和城市规划专业同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三结合组成的一个教育革命试点单位。现在，我们有十三个工程队、四千多名职工，一千多名师生和十多名设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回顾总结“五·七”公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切地体会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是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纲领。

与生产单位相结合，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们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建筑工地，和工人群众结

合起来，提出了一个“由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组成的教学、设计和施工三结合的统一体”的教改方案，成立了“五·七”公社这样一个试点单位，很快就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紧接着，成立了由学校、建筑工程队、设计院三方面成员参加的革委会。一九七〇年又建立了学校方面和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二公司”）方面统一的党委，对教学和生产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与生产单位结合办学，就是争取社会支持我们教育革命的一个尝试。“五·七”公社这种三结合办学体制，与厂校挂钩等其他面向社会的办学形式一样，保证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公社党委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是二公司的工人和干部。全公司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教育革命。七年多来，有占全公司工人百分之十的四百多名工人，先后在学校里和工地上负责或参加了三个月以上时间的教育革命工作，有的脱产，有的半脱产或不脱产。其中有近六十名工人较长时间地担任了工宣队员或工人教员，现在大多已经成为既懂生产又懂教育的干部。这些工人代表结合进了教学班、教研室、教材编写组、设计组、科研组等各个部门，参加了教学过程的各项活动。粘土里掺进了许多砂子，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改变了知识分子成堆的现象，教育阵地上开始逐步树立起了工人阶级的优势。

几年来，“五·七”公社经历了很多斗争。一九七二年，教育战线上刮起了一股名为批判极“左”实质上却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歪风。这股风也刮进了“五·七”公社，说什么“五·七”公社这种三结合办学“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降低了教育质量”，似乎只有走回头路才是唯一的出路。这股风一吹过来，公社里有些人一时辨别不清方向，竟随声附和地敲起“退堂鼓”来了。我们组织全公社人员认真看书学习，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路线上明辨大是大非。在这场斗争中，特别是几十名结合进学校各个部门的工宣队员和工人教员旗帜十分鲜明，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和政治作用。他们组织革命师生深入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又与师生一起对“五·七”公社五、六年来的办学实践从路线、体制、培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细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认真总结经验。工程队的广大工人也联系“五·七”公社的革命实践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坚定不移地积极支持教育革命，使大家认识到三结合办学、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等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心沿着既定的方向把教育革命进行下去。

广大工人群众与革命师生一起掌握着教育革命的方向、路线问题，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起了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许多优秀的工人代表参加了我们教育革命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才能比较顺利地按照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实行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一段时间，我们开进条件比较艰苦的山区，结合教育革命参加建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一些教师对于离开大城市跟着建筑工程公司进山区想不通，担心这样做没有前途。但是，二公司的一些老工人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们发扬了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带领先遣队走在进山队伍的前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重

担争着挑,危险争着上,为山区教育革命准备了各种条件。学员在山区进行典型工程设计时,二〇五工程队几百名工人专门召开了誓师大会,全力支持。有一次,为了设计方案中的一个问题,几十个工人跑到革命师生那里一起出主意。许多教师在与工人群众共同战斗的过程中,同样地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使是某些原来认识上比较落后的教师,也被教育革命的进展所鼓舞,跟上了队伍一起前进。这样地通过反复的革命实践,我们开始在教学和生产两者之间建立起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有机联系,获得了教学、生产的双胜利。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旦在工人群众中扎了根,工人群众就会时时关心它,精心培育它,促使它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搞教改,才能不断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 在社会生产服务的实践中改革教学

教育革命要依靠整个社会的支持,教育本身就必须努力为社会生产服务。这是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必须改革教学;也只有为社会生产服务,才能搞好教学改革。

“五·七”公社在一九六七年一成立,就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改革了原有的“三脱离”的教学方法。经过几年来的反复实践,我们逐步认识到,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一定要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前提,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开始,我们在选择工程时只考虑学校的教学要求,而不考虑生产的实际状况。这样,矛盾就来了,往往在几十项工程中还选不到一项“理想”工程。于是,有人就怀念起旧学校的老一套来了,说:“典型工程好是好,就是找不到。”吃一堑,长一智。大家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认识到每个教学阶段所需的工程固然应当根据教学要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这一点不能绝对化。如果离开了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不适当地片面强调工程的典型性,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最后必然要回到脱离社会生产的老路上去。因此,无论是选择工程或改革教学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从社会生产实际出发。这样去做,教学要求和生产计划之间存在的矛盾就可以努力取得解决的办法。去年九月,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机修厂急需上马,工民建专业三年级师生接受了其中七个车间的设计任务。这七个车间有大有小,有简有繁。开始,部分师生顾虑大的工程“吃不下”,小的工程“吃不饱”。但是广大师生和工人同志一起在实践中改革教学,对大的工程采取有分有合、定期交流、集体改图等方式,使每个学员做了厂房的一部分设计而对整体也有所了解;对于小的工程,则对某些不足部分辅以设计练习。这样,在胜利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教学要求也达到了。七年多来,“五·七”公社的师生在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的过程中,为国家设计了一百三十余项工程,其中有二十八项是国家重点工程,建筑面积达二十三万平方米,其中十七万多平方米已经建成。

要真正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必须改革原有课程的体系。旧工民建专业单是专业课和技术基础课就有二十门左右，教学顺序是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要设计一根梁，一年级在《理论力学》中学梁的支座反力，二年级在《材料力学》中学梁的内力分析，四年级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学梁的截面设计和钢筋配置，五年级在毕业设计中做梁的设计计算。这样的体系根本不适应结合实际工程组织教学的需要，也无法为社会生产服务。我们在实践中先是把旧教材删繁就简，增加一些专题的活页教材。以后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就逐步地按照各种类型的实际工程的设计、施工顺序，把一部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同专业课重新组合，初步改变了各科之间重复脱节的现象。经过反复实践，大家进一步看到生产实践过程需要各科知识的密切配合，又对教材进行了反复修改，使房屋建筑的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的程度逐步得到了提高。现在，工民建专业的专业课和技术基础课以及一部分基础课，通过反复实践，被重新组合成为五门主要课程，另加一些专题，形成了新的教学体系。最近，我们的数学教师还正在作新的尝试：打破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界限，结合实际工程，重新进行组合。

课程要改革，办学形式也必须进行改革。目前，全国有三百五十万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建筑工人，如果在每十名工人中有一名工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能力，就需要培养三十五万人。而全国有土建专业的全日制大学不过二十多所，就算每年培养三千五百人吧，达到三十五万人的指标就要一百年。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全日制大学也应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的途径。现在，我们除了普通班外，还有进修班、师训班、函授、短训班、专题讲座等各种形式，已经毕业的或正在学习的工人学员有一千一、二百人，超过现有普通班学员人数的一倍。我们在办短训班的时候，不仅教师办，高年级学员也办，开门办学到哪里，短训班就办到那里。这种学习，短小精悍，紧密联系实际，比较解决问题。最近，二公司搞升板施工新工艺，教师和技术员立即举办这方面的短训班，短训班一面办，升板施工一面就上了马。工人们通过短训班掌握了升板施工的基本原理、机械结构性能和施工特点，第一次试验性施工就获得了成功。

### 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这一指示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依靠社会的支持开展教育革命，并努力使教育为社会生产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为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一种尝试。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才能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就是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公社原有教师二百七十八人，还经常有上海工业建筑设

计院的十多名设计人员，他们大多数是能够或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为实现教育革命而奋斗的，其中有的人已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但是，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旧轨道上走惯了，一遇风浪就摇摆起来。只要我们正确地加以引导，他们身上的这种弱点是完全可以在“劳动化”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克服的。因此，我们始终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认真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提高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自觉性。我们在公社内部实行了干部交流的办法，一方面把工人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放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方面把教师直接放到工程队的第一线去。几年来，先后有三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作为工程队的工人、施工员、技术员、干部，参加了工程队半年至一年半的工作和劳动。我们还经常强调，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是接近工农、学习工农的好机会，鼓励教师抓住这种机会努力锻炼和改造自己。有一位教师支部的副书记兼教研室主任，过去认为“政治是软任务，技术才是真本领”。去年到二〇三工程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后，在工人群众的教育下，对政治与业务关系的认识起了显著的变化。最近，这个工程队组织了一个大体积混凝土浇注的会战工程，他在参加领导会战工程的过程中，思想领先，充分走群众路线。工人们发挥冲天干劲，苦干巧干，原定三天三夜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四十六个小时。这件事进一步教育了他，使他把接受再教育同做一定的领导工作统一起来，认识到了业务必须由政治来统帅，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尝到了理论结合实践的甜头，越来越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意义，过去只重视关门写冗长的脱离实际的论文，这实际上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他在工地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又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和工人、技术员一起搞了十多项技术革新，有的提高工效三倍，有的节约工程成本近万元。

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具备设计和施工的实际能力，而且迫切需要他们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这就向原有教师提出了一个在业务上再学习的问题。建造任何一幢房子，建筑、结构、施工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如果“隔行如隔山”，就无法完成教学任务和生产任务。我们根据这个道理，建立了综合性的年级教研室，给教师“压担子”，按综合性的课程篇章分配教学任务，广泛开展集体备课活动，能者为师，相互学习。现在不少教师已能打破原来的学科界限去承担教学任务，不仅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知识狭隘的状况，而且由于“多能”的结果，原有的“一专”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对于工农兵学员来说，同样也应当把“劳动化”和“知识化”在自己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视世界观的转变。工农兵学员有较深的阶级感情和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对他们的包围和影响，有的学员往往重视“知识化”而忽视“劳动化”。因此，我们坚持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不脱离工农，不脱离劳动，在风口浪尖上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首届工农兵学员中有个老工人班，平均工龄十四年，半数以上只读过小学，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一点也不放松，刻苦学习政治和业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七二年那股风刮进“五·七”公社的时候，老工人班的学员主动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取经学习，回顾了自己的办学实践，坚定地表示：“‘五·七’公社的经验符合毛主席的



教育革命思想,我们就是要开顶风船!”他们在工人教员和部分革命教师的支持下,总结结合典型工程组织教学的经验,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旧学校按照“理论——实践——理论”的模式教出来的学生,走出校门后总要在生产实践中经过长时间的重新学习,才能缓慢地逐步适应。我们为了使工农兵学员学到完全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按照毛主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安排教学活动,每个学期都安排典型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让学员参加生产实践的时间尽可能早一点,接触实践的机会尽可能多一点,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根据我们在实践中的体会,必须同时防止轻视理论和轻视实践这两种倾向,努力使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地结合实践来完成。学员们反映:“这样学,学得进,学得活,学得快。”目前建筑行业中正在大力推广滑动模板新工艺,有个班级在与工人一起试行这个新工艺的过程中,打破了洋本本上关于墙体厚度最小不能低于二十公分的框框,还采取措施使混凝土中钢爬杆的回收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并把激光、电视等新技术用到滑模施工中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果,显著地提高了工农兵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把学员“以学为主”的过程作为接近工农、转变思想的过程,以利于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搞工程的施工或设计,学员都坚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参加现实阶级斗争。大多数学员在这些实际锻炼中,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抵制了“资产”风,在怎样对待平凡劳动以及三大差别等重大问题上,逐步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最近,工民建专业三年级有些学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先后向党委写了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申请书,提出毕业后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去的条件艰苦的地区去!

不久前,我们调查访问了十四个省市一百四十三名首届工农兵毕业生,所在单位反映大部分学员能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能设计,会施工,拿得起,撒得开,有一股子革命干劲。有个毕业生分配在某市一个设计院工作。院里有套基础施工图在经过讨论后要修改,施工人员心急火燎,一天催几次,但原来负责设计的这个工程师对大家提出的意见抱有抵触情绪,眼睛望着天花板,按兵不动。院领导决定我们这个毕业生参加修改。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日夜苦干,推动了这个工程师改变原来消极怠工的态度,跟着一起动手改图,使这一任务得到了按时的完成。他在大庆搞设计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在某项技术资料上对我们的刁难,在三天三夜中只睡了几个小时,深入进行调查访问,寻找设计依据,最后解决了问题,获得有关部门的通报表扬。很多毕业生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群众说:“我们从新大学生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五·七”公社所进行的试验还只是初步的,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很不成熟,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决心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把“五·七”公社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工科大学而奋斗。

# 努力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

中共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委员会

毛主席的“七·二一”光辉指示，发表已经六年多了。毛主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是对教育部门讲的，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工厂企业讲的，是对我们工人阶级讲的。六年多来，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不仅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工厂办教育的形势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最近，我们局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联系工业战线办学的斗争实际，重温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了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的自觉性。

工厂办大学，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和技术上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需要。列宁说：“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机电工业担负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但是，我局目前的技术队伍不论在数量、水平方面，在工人技术人员所占的比重方面，都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据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局三十五万名职工中，技术人员一万九千名，仅占全局职工的百分之六，而且分布很不平衡，尤其是在小厂，技术人员更少，如机配公司系统二万五千职工，技术人员只有二百四十一人，占百分之一也不到；同时，全局工人技术人员不到四千名，只占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呢？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通过普通全日制大学进行培养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去年一年国家分配给我们一百十三名大学毕业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技术队伍；同时我们还要自力更生，自己积极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工厂办大学，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从来是阶级专政的工

具。今天，抓教育，决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什么“软任务”，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一项硬任务。加强党委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落实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贯彻“鞍钢宪法”、走“工业学大庆”道路，使我们的工厂企业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大学校的一项战略任务。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应当象大庆那样，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建设一支紧密跟工人结合、跟实践结合的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经得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考验的团结战斗的指挥部，使企业成为反修防修的战斗堡垒，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工人同志们说得好：“社会主义企业如果只抓产量千百万，不抓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百万，不仅产量千百万难实现，红色江山还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工厂办大学，也是实现“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一战略任务的需要。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指示，深深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工人在工厂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在生产、技术领域里，一部分企业的工人群众还没有发言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工人“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是陪衬”的现象。一些科研院所和工厂的技术、设计部门，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扩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一面，发展下去就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在所有制方面的复辟。要改变这种局面，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加速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因此，走“七·二一”道路，不只是培养几个技术人员的问题，而是为了上层建筑领域里从学校这一方面堵死修正主义道路，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企业。

最近两年，我们经常召开各级党委书记会议，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批修，一起分析工厂办学的形势，一起总结经验、制订规划。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召开了五次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和现场会、经验交流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学习朝阳农学院的重要经验，总结工作，寻找差距，明确方向。并且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组织上也加强了领导，局党委有一名副书记分管教育工作，还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加强了对日常工作的指导。同时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依靠群众层层办学，教学内容也不断发展。目前全局工人大学已从批林批孔运动以

前的十六所，发展到五十二所，学员二千一百多人。

通过办工人大学，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许多工人同志经过学校学习，成为工厂理论队伍的骨干，大学习、大批判的闯将，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上海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一九七二年办了文科班。文科班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紧密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当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全班二十名学员分成四、五个战斗小组，完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提出的一批战斗任务。四届人大闭幕后，他们在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基础上，又写了一份《新宪法通俗讲话》，向全厂理论队伍骨干宣讲，推动群众学习。学员们不仅积极投入厂里的斗争，同时还密切注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用战斗的笔，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以猛烈的回击。一九七二年，社会上曾一度刮起青年“一代不如一代”的阴风，厂里也有人说青年艺徒“一届不如一届”。他们就根据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感受，从各个侧面描写了青年一代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的故事，出了短篇小说集《小将》，有力地批判了“九斤老太”哲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又写了一篇以反对倒退复辟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大梁》。第一期二十名学员中，发表的各种大批判文章和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文艺评论，共达二十多篇。

通过办工人大学，培养了一批工人技术人员，进一步改变了工厂技术队伍的成份。在有的单位，工人技术人员已在整个技术队伍中占了优势，大大地有利于工人阶级进一步掌握生产、科技领域的领导权。几年来，全局已有工人大学毕业生五百六十五名。上海机床厂磨床研究所，这几年来，在所党支部、革委会、工会领导成员十四人中，工人技术人员有十人；十个组室的主要负责人十人中，工人技术员有七人。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工人学员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断清除修正主义的流毒，在生产、科研工作中沿着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前进。沪东造船厂工人大学学员，在参加某产品设计实习期间，发现有只螺旋桨的材料规格和加工工艺完全按照苏修图纸的规定，加工困难，工艺落后，效率很低。在党组织支持下，工大学员和工人老师傅一起，自己动手，采用国产材料，改用我国自己的先进工艺，不但加工方便，效率提高，而且加大了螺旋桨的推力，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许多工人学员和毕业生，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既会劳动，又会设计。有些同志在完成“急、难、新、尖”的生产、科研任务和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中，发挥了突击作用，作出了较好的成绩。上海锅炉厂工人学员在四个月的毕业设计中，计算了七个煤种和四十多种技术资料，进行十二个方案设计，绘制近千张图纸，完成了十二万五千瓩电站锅炉的“三

化”(通用化、标准化、系列化)设计任务,目前已正式投产;为一个煤种、一个锅炉、一套设计的单个独产转变为定型批量生产,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上海汽轮机厂分配到七车间的工人学员,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跟工人师傅共同研究,自行设计制造了两座点波冷却塔,每年可节约自来水二十二万五千吨,节约电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度,每年节约价值总计近三万元。该厂工人学员还单独承担了我国第一台六十万瓩汽轮发电机的一个部件的设计,在两个星期内就搞出十六个方案,由工人学员带到天津参加全国会审,经电子计算机核对,他们的计算全部准确,受到好评。

随着工人大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学校学理论、学技术,这就使教育同生产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地把整个工厂办成一所大学校。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的工人和干部,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办起了一所“船台学校”。他们围绕“朝阳”号万吨轮的施工任务,密切结合生产实践进行教学活动。教学过程中以能者为师,老工人、技术员兼任教员,船台当教室,铁板当黑板,图纸和实物作教材,工人们既是学员、教员,又是生产上的战斗员、指挥员。车间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教学单位。生产中的重大项目就是教学的主要课题,工人学习的过程就是完成生产项目的过程。这个新鲜经验得到了领导上肯定,在全局系统引起了连锁反应。又如沪东造船厂党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全厂和车间办了五个大学班,在校学员一百五十人。五年中,举办了政治夜校,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等各种政文班,船舶制造、数控、电子、医学等各种技术班、短训班和讲座共达六百多个,参加学习的职工累计达二万二千多人次,培养了一大批工人理论骨干和技术队伍。目前,全厂有四千多个职工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我们局和造船公司多次推广了这个厂的经验,使各种形式的教育越办面越大,越办越向下,形势越来越好。现在不仅一些大厂车间办、工段办,而且不少小厂也积极创造条件办学。可以设想,不要很久,将有较多的工厂办成这样的大学校。那里的工人群众,既是工人,又是大学生,既从事生产劳动,又进行理论和技术学习,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正如他们自豪地形容的那样:“拿起榔头能做工,拿起仪器能设计,拿起笔能搞大批判。”这对于加速建成一支宏伟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几年来,不少基层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遵循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一面带头参加学习,到厂校学政治、学文化,一面又自己到七·二一工人大学讲课,这对工厂办教育起了很大作用。上海机床厂党委把教育革命放到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学习其他兄弟单位抓好职工教育的好做法,推动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断前进,厂和车间两级的各种技术、文化班也有很大发展。在上海机床厂党委领导认真办学这个典型的推动下,不少公司、工厂党组织也认真加强了对工厂办学的领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委抓教育,主要是抓方向、路线。几年来,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问题,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是坚持“抗大”的革命传统,反对资产阶级的“正规化”;二是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智育第一”;三是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办学。

就拿第一个问题,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正规化”来说吧!七·二一工人大学刚刚办起,就出现了所谓“正规”和“不正规”的斗争。有些受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影响较深的人们,认为工人大学一定要办得“象样”一点,培养出来的工人大学生才“有用”。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也有个旧框框,一讲起办大学,就联想起旧学校那样的“气派”,不知不觉地也追求起“正规化”、“大洋全”这一套来。他们往往向往“牌子大一点,房子好一点,教材齐一点”,认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大学。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联系这方面的斗争实际,引导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反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讨论怎样对待所谓“正规”的问题。我们有些老干部回忆了当年“抗大”的光荣传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打仗,战场就是课堂,墙壁就是黑板,毛主席著作就是教材,学员和教员能文能武,会讲会做,“抗大”的作风就是正规的作风,它战胜了任何强大的敌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今天,我们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当时好得多了。办学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但并不需要很多,我们工厂就是扫扫仓库,挖掘潜力,依靠这点物资,也可以办起一所大学。上海群联机械厂是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厂,工人们自己动手,用旧木料做了一些简易的教具,挤出一部分办公室作为教室,办起了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第一期招收了十六名学员,学员和教师都是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他们坚持业余为主,每周学习六小时,以自行设计和制造高效率、多工位冷镦机为教学内容,边学边干,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受工人们的欢迎。

我们在办学过程中,也得到了普通全日制大学革命师生的热情支持。他们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工厂,同我们工大师生一起学习,一起批判,一起搞教育革命。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机械学院等单位,在师资和教材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这样的挂钩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我们欢迎他们继续对七·二一工人大学给以支持和帮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局系统的职工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与党对我们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心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不断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落实规划,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 他们是怎样当好生产参谋的？

——对一个单位坚持调查的调查

章智明 王之璋

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一个不大令人注目的单位。这儿有商场，却没有顾客；有柜台，却没有营业员。神秘吗？也不神秘。它就是负责采购全市四百多家工厂生产的百货文化用品、供应全国城乡市场的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

走进这个站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一块块小黑板上，写着一批又一批下厂、下乡调查人员的去向。据说，近年来，这个站始终坚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员轮流下去搞调查研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又取得了哪些经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这儿开了一些座谈会，看了他们平常写的工作总结。

这些口头的和书面的材料，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我们从中摘录了一部分，作为这篇调查报告的正文。

塑料科的  
总结

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下去以后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凭懒办法捞点材料，就忙着上来“拍板”，这个“板”非拍错不可。我们就吃过这种亏。譬如：我们有次到浙东农村去，看到很多农民在雨天都穿着蓑衣干活，便想，这种蓑衣又笨重、又漏水，搞一种塑料农用雨衣多好！于是，就转了几圈，找人聊了几句，回来便把城市雨衣和蓑衣的式样来个两结合，试制了一种塑料农用雨衣。谁知一试销，反映可大啦！有的讲它“不顶用”，有的讲它象“龙袍”。什么原因呢？经过了解，才知道塑料雨衣虽然比蓑衣来得轻巧，但也正是由于轻巧，大风一刮，前后两面飘了起来，下半身的衣服又给雨淋湿了；而且，这种雨衣主要用于干农活，光按城市雨衣的式样仿制，适应不了各种农活的特点。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认识到：只知道农村需要塑料雨衣，仅仅是了解了事情的一方面，要知道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塑料雨衣，还必须从事情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就需要下苦功夫，花大气力。否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可能掌握各方面的因素并进行概括工作，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我们再次深入农村，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在收集大量意见的基础上，试制了一种新式的塑料农用雨衣。

那末,能不能说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就算是下了功夫呢?也不尽然。当我们拿了新式的塑料农用雨衣再去征求意见时,群众仍然有不少不满意的反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们穿上这种雨衣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这样一体验,感受才大不一样。原来穿了这种雨衣插秧,低着头时,两片衣角浸在水里,拖泥带水,行动不便;直起身子时,帽沿把眼睛遮住了,面前一片迷迷糊糊。耙田时,手臂摆动的幅度大,用力过猛,雨衣的袖筒就裂开了;挑秧时,担子稍重些,一转肩,肩头和颈后的那部分雨衣便扭碎了。这下,我们才对这种塑料农用雨衣上的缺点和改进的措施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象衣角要浸在水里的问题,我们和贫下中农当场在田头试验后,决定在腰部增加两只小钮扣,插秧时把衣角翻进去扣住,就再也不会沾湿了。这说明,搞调查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听间接反映,而要象毛主席说的:“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获得亲知。

塑料农用雨衣在支农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们在进一步调查中又发现,它还适应不了菜农、船农、渔民等多种的需要。为此,我们又对这些农民进行访问,针对他们的工作特点,和工厂一起试制了多种类型的雨衣,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这告诉我们:要真正搞好调查研究,就得不怕麻烦。

#### 家用化妆科的总结

下去搞调查研究,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多了,第一手材料掌握的也多了。但是,如果脑子想的少,只有调查而无研究,还是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站有人曾召开过资本家座谈会,让他们谈家用化妆品的发展问题。结果,反映这些人要求和意见的“高、贵、奇、洋”的化妆品出场了。单单是香水,就有千里香、夜来香、连环香等几十种,其中的辉煌香水,一小瓶才一百二十克,价格却高达三十多元。相反,为工农兵群众真正需要的化妆品倒被排挤掉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高、贵、奇、洋”的化妆品被当作污泥浊垢冲掉了。这也使我们深思起这样一个问题:在调查研究时不能搞真伪混杂、是非不分的“有闻必录”,而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种意见取分析的态度。

这种分析首先是阶级的分析。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其正确还是错误。一度,我们听到不少意见是批评过去搞五花八门的“香水”“香粉”,就错误地以为问题出在“香”字上,便让工厂把香脂一类的护肤用品改成“淡香香脂”。谁知由于香料成份过少,没多久,里面的油耗气跑出来,香脂变成了“臭脂”,群众很有意见。其实,在护肤用品中放入一定成份的香料,一则可以抵制油耗气,二则可增加一些香味。这对劳动人民来说同样是需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具体问题没有作具体分析,吃了形而上学的亏。接受了群众的意见,不仅恢复了香脂,还增加了许多新的花色品种,这才满足了工农兵群众的需要。

在调查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也就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在江苏农村访问时,许多贫下中农反映说:“这儿是早上出工蠓子叮,晚上收工蚊子咬,田里还被蚂蝗吸,搔破了皮肤,伤口溃烂,还要影响生产。”在建筑工地调查时,我们又看到不少工人手脚开裂很严重。工农群众迫切希望我们搞些防咬、防裂的护肤用品。但也有人讲:“这是医药公



司的事。”我们想，医药公司和百货站的分工，本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分工不应该绝对化。如果把专业分工凝固起来，不就是用自己制造的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阻碍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吗？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立即和工厂及有关部门协商，生产了蝶飞子水、稻田护肤膏、防裂膏、治裂膏等一批新产品，受到了工农群众的欢迎。

在调查研究中取分析的态度，还在于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市场上的护肤用品时多时少，这是我们最头痛的问题。多了，库存积压，只得砍生产；少了，市场脱销，就拚命赶生产。这种造成生产上大起大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被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用机械平衡的方法让工业跟市场跑。前几年，市场上香脂供应比较充沛，各地纷纷反映香脂生产多了。到底多不多？我们向五个省、市进行了调查，发现这种多并不是真正的多：有一部分是有关批发站过去积压的，“清仓查库”后“泻”出来了。即使是有的地区多了，也不是所有品种都多，一般来讲，是雪花这种护肤用品多了一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多，有的地区仍然有香脂供应不足的情况。另外，我们还看到各地市场上香脂的零售数量正在逐步增长。这说明，眼前的多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是“不多”。因此，我们没有就事论事地砍生产，而是与工业部门协商，对生产计划作了适当调整，扩大花色品种。近几年，香脂的需求量又开始上升，说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是对的。可见，通过调查研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重要的一环是要对事物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 胶鞋科的总结

我们想通过对防滑雨靴的试销，来谈谈对调查研究的一些看法。

防滑雨靴刚试销时，我们有几个同志曾在江苏农村作过一番调查。

许多农民反映：“穿上这种雨靴，走路倒不容易摔跤了，就是前面的人在走，后面的人要被溅上一身泥水。”由于我们不懂产生这个问题的技术原因，只好作个“质量还须提高”的抽象结论。后来，胶鞋厂的工人、技术员去一看，才知道毛病出在雨靴后跟的一条槽上面。从设计角度考虑，是为了让泥水从槽里排出去，实际上由于脚踩下去时总有股压力，泥水就乘势从槽里冲了出来。这下，才使“质量还须提高”的抽象结论具体化了，同时也就找到了改进的措施。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首先是调查者本身不能光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无论是商店，还是工厂或技术部门，由于工作的任务不同、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往往会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看法，难免存在一些片面性。“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要克服这种片面性，参加调查的人就必须要有代表性和群众性，这样，才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和考虑问题，互相取长补短。后来，我们采取了工商联合调查的形式，对问题就看得比较全面，解决起来也就比较及时、准确了。

当然，即使是工商联合调查，也并不意味着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工商联合调查的人再多，到了农村，毕竟还是少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江苏的张浦和梅村、安徽的舒城和舒茶设立了四个试销点，专门组织新产品供应给这些地区的群众。在试销点下面，又设立大队的综合性商品联系点、生产队的单项性商品联系队和贫下中农联系户。这样，新产品出去就不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而是“看得见，听得到”。平时，试销点的同

志帮助我们收集群众对产品的意见；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下去开调查会。一大批联系点、联系队、联系户成了我们的“了望哨”、“气象台”，群众性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展。有一次，我们为了调查防滑雨靴的式样、牢度等问题，江苏张浦有个群众调查员，主动帮助我们把一个大队的几十双旧雨靴回收了来，还带来了社员不少意见，使我们弄清了防滑雨靴设计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少数人的实践范围总是狭窄的，群众实践的天地才是广阔无限的。所以，向谁作调查，也有一个代表性和群众性的问题。就拿提高防滑雨靴的质量来说，我们就分别向山区、沙土区、水乡地带的农民征求意见，就是同一地区内，也听取不同工种和男女老少等不同对象的意见。比如：水乡地带的农民希望把鞋底的花纹改得不易粘住泥土，沙土区的农民则要求在鞋底头部有一块月亮形的加固，使鞋头在坚硬的土质上不易磨损；而挑担、开河的农民则最关心鞋底断裂。一下子，各种各样的意见汇集拢来，为我们进一步改进防滑雨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看！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多重要啊！

### 站党委书记的体会

站里的同志迈开双腿，下去搞调查研究了，领导怎么办呢？我这样想，作为班长，当然应该认真抓好理论学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管好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学理论有个联系实际的问题，路线、方向也并不是空洞的，它往往通过一些具体矛盾反映出来。所以，一个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决不能满足于坐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关起门来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调查研究。

前两年，我们站曾在铝锅的购销问题上发生过一场争论。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工厂的生产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们应该提高铝锅的采购量。有的同志却不同意，认为这种东西一般只销售城市，不销售农村，大量上马后会被动。谁对谁错，我自己也吃不准。后来，我到农村的四个试销点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心里才有了一本“谱”。在安徽舒城，我看到一个生产队的五十一户社员中，有四十六户用上了铝锅；江苏梅村的一个大队的四百九十一户社员，用铝锅的也有四百五十户。这说明，铝锅不销售农村的经营方针是不对的。在安徽舒茶，一个社员为了节约柴草，还专门砌了一种铝锅灶，他对我们说：“铝锅比铁锅耐用、实惠，假如能搞专门的节柴铝锅就更好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直翻腾：农村不仅大量需要铝锅，还需要适合农村特点的省柴铝锅呢！这时，我才知道了对铝锅是压缩生产还是扩大采购，里面有一个为不为农村着想的问题。回来以后，我们党委就抓住这件事向职工进行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教育，使大家的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现在，我们供应农村的铝锅不仅大大增加，而且还和有关部门一起，试制成功了省柴铝锅，在不少地区得到推广。可见，做基层领导工作的，也只有沉下去，亲自调查分析那些反映路线问题的具体矛盾，才能真正把路线、方向管好；否则，还是抓不到点子上去的。

毛主席说：“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是千真万确的。经常到工厂、农村搞一些调查研究，这不仅使我们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而且也能清楚地看到那种高高在上、指手划脚的领导作风是多么害人啊！因此，领导干部亲自参加调查研究，既能加强对实际工作的领导，也可冲刷掉自己身上的官气和暮气。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就说明，调查研究是项长期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搞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了一点直接经验之后，手脚就容易懒起来。拿我们科经营的乐器来说，总以为已经向各方面摸过几次“底”，市场上的需求量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了。谁知有一个时候，京剧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的需求量一下翻了六、七倍。许多零售店上门告急，有些地区的批发站也来电要求增加调拨量。这下，真把我们搞得手忙脚乱。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走访了十三个省、市的有关部门。原来，人民日报《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短评发表后，群众性学唱革命样板戏的活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京剧三大件的供应对象也就从专业剧团和文艺爱好者扩大到一般群众。这么一调查，看到我们自己还是捧着“老黄历”过日子，那怎么会不手忙脚乱呢？

“笃悠悠”变成“手脚乱”这个事实，给我们指出了：不能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劳永逸的事。革命实践总是要发展的，乐器的需求量也势必要随着发生变化。在过去的调查研究中，我们摸索到了乐器供应工作上的一些规律性东西，这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调查研究的借鉴，从而加深对这种规律性东西的认识，但它决不能代替今天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跟上不断变化着的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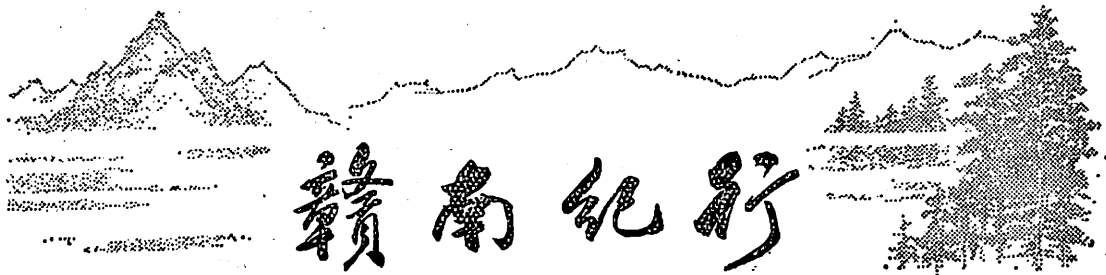
要弄清乐器供应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主要是找出制约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从实践中感到，这就要不断调查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中革命的状况，从中看出对乐器需求量所产生的影响。前些日子，我们通过乐器展销的形式，在青浦、川沙、松江三个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川沙有个公社的小学教师告诉我们，她们实行开门办学后，就经常组织学生到田头演出，因为没有手风琴，只好把风琴扛了去。松江有不少知识青年对我们说，他们在业余时间很想多搞些文艺活动，但除了有几根笛子和几把胡琴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乐器了。青浦县文化馆则对我们谈了他们准备在每个大队建立文艺小分队的设想，希望我们为他们配备一些“放音洪亮，结构牢固，价格便宜”的乐器。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开门办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文艺小分队，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决不是一个县或几个县有，它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给我们乐器供应工作带来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责任就要掌握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工厂的支持和配合下，使乐器生产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总之，实践没有顶，调查研究无止境。……

\*

\*

\*

读着这些总结和体会，我们曾经这样想：他们花这么大的人力进行调查研究，会不会影响本身的工作？事实是，他们坚持这样做，看上去留在站里的人是少了一些，但是，正由于把日常工作 and 调查研究结合了起来，对市场的情况了解深了，考虑问题更切合实际了，提出的措施也比原来扎实多了。这样，就避免和克服了原来在计划、采购和供应等方面的盲目性，对工作起了促进作用。几年来，这个站的商品收购和供应连续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花色品种不断扩大，工商关系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提出的“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的号召，对于我们搞好各项工作是多么地重要！



# 赣南纪行

吴文虎 曹 溶

同志，你到过赣南吗？这是个有着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山丘盆地，全区面积比台湾省还略大一点。它东邻福建，以武夷山脉为界；南靠广东，以九连山脉和大庾岭为天然屏障；西接湖南，有罗霄山脉突兀其间。当地民谚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它的地理面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赣南是红军的摇篮。在这个举世闻名的老革命根据地里，曾经留下了毛主席为革命辛劳奔波的无数足迹，它所哺育的成万红军战士从这里出发，跟随着毛主席踏上征途、转战四方……

今天，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正哺育着新的一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先后有十多万名知识青年奔赴江西农村，其中在赣南的就有一万多名。他们在那里生活、战斗得怎样？锻炼、成长得如何？——四月五日，我们带着这个为许多家长和整个上海工人阶级所关心的问题，从上海出发去赣南了。

## 一、从军山湖畔到芙蓉山麓

四月六日，我们在江西省进贤县下了车。

从上海到赣州有三条路：西路经沪杭、浙赣线到南昌，改乘汽车顺吉安进赣南；南路乘沪粤快车到韶关，转南雄入赣；北路经浙赣线在进贤下车，过抚州地区的南城、南丰进入赣南的广昌。我们选择的是北路，原因是听说抚州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不错。因此，想在叩开赣南的大门前先访问一下抚州地区。

进贤县属抚州地区，地处鄱阳湖平原，湖泊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七，平原和丘陵分别占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是一个丰盛的鱼米之乡。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南台公社。这个公社象一只巨大的靴子伸进了军山湖，三面都被碧波荡漾的湖水包围着，宛如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海知识青年在这里有八十多人，分别组成十个青年班，集体插队在各个生产队里。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栋由六间住屋、一间灶间组成的瓦房，门前有两个小青年在磨豆腐，这就是山里生产队青年班的住所。进门没谈上几句，他们就给我们每人倒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原汁豆浆。我们边喝豆浆边谈，只听得外面“咯咯咯”、“呷呷呷”，尽是一片鸡鸭欢叫声。青年们笑着告诉我们，除了这成群的鸡鸭，他们还有一口大肥猪躺在圈栏里呢。

我们在与董杰生等青年的谈话中知道，这个青年班现有五个人，分别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生产队长、拖拉机手、仓库保管员和农技员。去年一年的劳动收入，除了每人分八百三十斤稻谷、六斤麻油、二斤棉花以外，这个五个人的集体户还分有大豆四百多斤，小麦一百十斤，芝麻五十六斤。此外，每人还进款一百多元。谈着自己政治上的成长和生产上的成果，青年们都爽朗地笑了。

“你们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我们问。

“主要一条，是公社贫下中农把我们当成了‘老崽’！”一个青年抢着说。

“啥叫‘老崽’？”

“‘老崽’就是小儿子，是老年时得的儿子。”他们说。接着，七嘴八舌地给我们讲了一件发生在下乡后不久的事：一天，县电影放映队到了公社，党委的几个书记马上想到上海知识青年来了以后已有一段时间没看电影了，就叫办公室的同志分别通知全公社的知识青年来公社看电影。没想到初夏天气多变，露天电影的放映中途，突然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来了。青年们正准备冒雨赶回生产队，扩音机里突然传出通知：要青年全部集中到公社会议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公社党委的正副书记马生根、胡英文同志正在为这批“老崽”操心着呢。他们眼看雨一直哗哗地下个不停，决定通知公社的机关干部都来开会，专门研究青年的住宿问题。会上，两位书记提出了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给青年住，其他公社干部也纷纷把自己的床让了出来。知识青年们看到公社干部们留下一张张床铺，自己却冒着大雨走出宿舍去另找住处，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十二日，我们从军山湖畔来到了乐安县。这里是山区，平原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三。东、南、北三面皆为雩山余脉，芙蓉山峰突起其间，高一千米左右，兀立境东。因此，这里的知识青年被称为“芙蓉山下新一代”。记得来乐安途中经过专区所在地抚州时，乡办主任老许和慰问团老吴、老徐等曾告诉我们，这个专区的不少单位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可能，正在逐步地把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集并起来办青年场、队，组织一部分贫下中农参加，这些场队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既搞好粮食生产，又开展多种经营，有的还办了小工厂。到乐安县一问，果然，他们县已办了四十多个青年队，集并了约百分之四十的插队知识青年。县乡办的同志把我们领到了县境最南端的金竹公社青年队。这个公社离县城一百多里，一路上路陡山险，林木葱茏，路旁还不断可以看到成堆待运的竹木，处处显示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有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你想，这个只有一千四百多户的公社，山林面积就有近十四万亩，还有一万六千多亩成片的竹林。这可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啊。

刚从公社机关的后院出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早稻禾苗。陪同我们的干部

说，这是青年队今年首次在高山上试种的二十五亩双季稻，争取亩产上“纲要”。他们还自己办了食堂，种了三亩八分蔬菜地，养了猪、鸡、鱼。伙食有了专人分管，比过去的一人一灶时要方便多了。

我们先看了青年队办的一个小型竹木加工场。当地竹子多，青年们就地利用，现正在生产油布伞骨。他们有的劈竹，有的削骨，十分忙碌，旁边放着成箩的制成品正待运出去。我们问：供、产、销的渠道是怎么沟通的？慰问团的老房说：县委抓了一下，县土产公司帮他们联系，同上海油布伞厂签订了合同，在省市协作会议上定了下来。去年头一批产品由于运输不及时霉坏了，县土产公司还主动承担了这笔损失，坚决支持他们办好小工场。现在他们的生产技术已比较熟练。去年，不仅他们派人到上海工厂去学习，上海手工业局的油布伞厂也专门派了两位老师傅来此实地指导。有位徐师傅对青年可关心啦，不仅精心地传授技术，而且经常做政治思想工作，忆苦思甜，教育青年要下决心艰苦创业，在山区扎根一辈子。青年们说：“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对我们的关怀，这样的老师傅今后能否多派一点？”我们觉得，为了把这类就地取材的小工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大城市的有关单位是应当尽到这个责任的。

离开小工场，就到了青年队的宿舍。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新房，上上下下一共有二十多间。其中有一大间是队里的会议室兼图书阅览室，也是他们的乒乓活动室。一个个房间都很整齐清洁。青年们自豪地说，这一切都是用我们自己双手的艰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开始办场时，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背着米、挑着锅上山砍毛竹，住的是树皮屋顶的茅竹棚，吃的菜是带上山去的五十斤萝卜干。就这样从山上取来了一大笔生产资金，加上县里拨来的一部分经费，就造起了新宿舍和新厂房。

谈话时，有个青年风趣地说：“我们打算多留点积累，再多造点房子，准备结婚成家哩！”公社乡办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旁笑着插话：“青年们大多二十六、七岁了，在全队六十多个青年中，在谈恋爱或准备结婚的已有十对了。”

晚上，我们在他们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几个青年一再鼓动一个姓刘的青年发言。小刘是个棒小伙子，身材高高大大的，可是翩翩得很，只是笑，不说话，最后还是别人帮他开了腔。原来小刘过去好打架，绰号叫“八爷”。有些干部一提到知识青年难弄，就拿他作典型。但小刘在青年队这个集体里，通过学习和帮助，思想有很大的转变。现在他表现很好，干重活、累活都抢在头里。有一次砍竹子从山上滑下来，眼角划破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但他想到要艰苦创业哪能不吃苦？就不去包扎，继续扛着竹子下山，走了三里多路。路上有人见他流血，问他：“你又同谁打架了？”小刘一听，感触很深，说：“过去打架，影响真坏啊，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消除坏影响。”

除了小刘外，其他青年也各有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他们那些火热的言词中，我们激动地看到，这些“新时代的创业者”，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现在我们青年队收入多了，但大家都不主张多分。最近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决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多留积累，扩大再生产，加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加速

实现农业机械化！”

话匣子打开了，不觉时间长。电灯开始一闪一闪地眨眼了。青年们说，这是山村小电站在发信号，表示已到十点，即将熄灯。不行，话还没说完呢！他们立即通知小电站，要求临时推迟熄灯时间。于是，他们又兴高采烈地谈了下去，欢乐而畅快地谈到了青年队的未来……

看着青年们一张张精神焕发的笑脸，听着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发言，我们想，这种在公社党委关怀下、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的青年队，是多么生气勃勃啊。

县乡办的老危同志说：“开始时有些干部不大赞成办这样的青年队，认为青年一集中，乡办的工作量就要比分散时大得多。但为了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我们认为就是要乐于找麻烦。”

说得好，革命就是要多找“麻烦”嘛！

## 二、宜黄途中

宜黄是乐安的毗邻，这两个县同属于抚州地区。我们原想离开乐安后即去赣州，但由于慰问团提出宜黄县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不错，应当去学习一番。于是，我们现在行进在向宜黄的途中了。

宜黄境内有两条大河，东曰宜水，西曰黄水，县城座落在两水的汇合处，因以得名。这个县有上海知识青年一千二百多名。刚落脚，县乡办的老宋就建议我们到神岗公社去。他说：“正好明天县里有一批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的干部到点里去，有一辆交通车可顺便搭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县招待所门口上了车。这时已早有几个同志坐在车上，其中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长得健康、结实，神色沉静地象在思考着什么；她手里捏着个馒头，一口一口地咬着，大概是怕误了开车时间，把在招待所食堂里没吃完的早饭带到车上来了。我们心里有点纳闷：县委派出的工作干部中，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女同志？

车子开了一程，停在县委门口，又上来几个背着行李卷的干部，带头的一位五十多岁，操北方口音，笑咪咪的，态度和气可亲。慰问团的老冷连忙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在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青年，叫了她一声“小徐”，走过去坐在地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攀谈起来。

很奇怪，这个沉静的女青年遇到县委书记后，竟象在她们小姐妹群中一样，无拘无束地谈开了，时而讲“老表话”（即江西当地方言），时而讲普通话，一会儿象在与战友商量工作那样地老练、泼辣，一会儿又象一个在尊长面前的调皮女孩，不时地显露出孩子气。我们听出，她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还夹带着一些上海口音——原来她也是个上海知识青年！

我们问她：“来这儿几年了？”

她说：“我在神岗公社插队已有四、五年了，这次被县委抽调去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说着她又调皮地看了书记一眼：“到书记蹲的这个点里去接受再教育嘛！”

书记笑着对我们说：“上海知识青年经过锻炼，成长很快，已成了三大革命运动中一支生力军。问题是要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进步作用。”

小徐指着书记对我们说：“成长是因为党的培育，县委对我们很关心。”对此我们毫不怀疑——从他们熟悉的程度上就可看出这一点。

当她知道我们正是到她的老家——神岗公社去，她更高兴了。

.....

车上的谈话时时被窗外闪过的景色所打断。这正是映山红——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到处红艳艳的一片，车子在花的海洋、红色的海洋中行进。昨夜蒙蒙的春雨，把这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滋润得分外鲜艳夺目，花瓣上还分明看得见有晶莹的水珠在滚动着。当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暖融融的阳光，红艳艳的山花，几乎把县委书记、小徐和我们全车人的脸都映红了。杜鹃花啊杜鹃花，怪不得当地人都管它叫“映山红”呵！

我们到了神岗公社，公社党委书记朱健雄同志和副书记薛志鹏同志亲自跑来接待我们。薛志鹏同志身材高大，脸色黝黑，是一位很年轻的干部，但又显得十分稳重干练。我们一打听，原来他也是上海知识青年，曾经是上海青浦中学的学生，现在公社党委中分管社办企业、文教卫生和上山下乡的工作。

我们细细地端详着这位年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心里不禁想道，即使他不开口介绍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他本身不就已经有力地证明着知识青年前进的步伐和成长的速度吗？

不一会，我们已坐在会议室里，听着这两位正、副书记的介绍。他们说，这个公社的一百六十名知识青年，现已集并为一个青年队，十六个青年班。其中已有六人入了党，一百二十多人入了团，六十多人担任了公社、大队的领导职务和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大批青年积极分子正在不断地涌现……

“就给你们讲讲女知识青年徐定月的事情吧！”在作完一般介绍后，他们兴致勃勃地继续说。

下面就是从他们嘴里记下的徐定月的故事——

徐定月是个共青团员，下乡后一贯表现积极，后来被贫下中农推选为“赤脚教师”和夜校辅导员。她这人有一个特点，见到对集体不利的事，总爱说上几句，因此有人就在背后讲她“多嘴多舌”。队里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家伙，经常受到她的批评，怀恨在心，意图报复。他走东家窜西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徐定月把孩子教坏了！”但贫下中农都不听他的。他无法可想，就和一个有贪污行为的会计勾结起来，不给小徐记当教师的工分，想通过这个恶毒办法把徐定月挤走。

小徐有广大贫下中农支持，怕什么？她说：“一个工分不记，我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培



育贫下中农的子女，要撵我走，休想！”

公社党委知道了这事，支持小徐。贫下中农也气愤地揭发了那个会计的贪污行为，还撤了他的职。但是，谁来接替会计的职务呢？贫下中农都认为小徐最合适，可她既做教师又做会计，怎么能忙得过来？小徐知道了贫下中农的心思，说：“替贫下中农掌财权，还怕忙？”就勇敢地一肩挑起了会计和教师这两副革命担子。

这一来，那个下台会计对小徐更恨了。有一天，他故意不出工，但却又偷偷在自己的工分账上记了工分，过一段时间与小徐记的工分一对照，就大声叫嚷：“啊呀，你们看，新会计把我的工分记少了！账都不会记，哪能当会计？”在他的煽动下，有几个不明真相的社员也跑来找小徐对工分账了。

小徐明知这里有鬼。但她沉住气，仔细地查了账，不慌不忙地作了调查，等到把情况全弄清楚了，就把工分账全部公布，并当众严厉责问那个会计：“你没有劳动，哪来的工分？”这一下真相大白，那几个原来不明真相的社员也就都醒悟过来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个下台会计竟煽动个别落后群众说粮食不够吃，吵着要分储备粮。小徐想，社员大人小孩每人平均已经分了六百斤口粮，怎么会不够吃呢？她为了击退分粮阴谋，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地对社员进行了家庭访问。贫下中农指着米缸、粮囤对她说：“不够吃？笑话！”后来，就连那些曾经闹着要分粮的人也都一个个被小徐说服了，明白自己是受了骗了。

事情是不是完结了呢？没有！去年有一天，小徐听到一个消息：那个下台会计又与那个伪保长勾结起来在煽动分粮，而且利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小生产私有观念，作出了私分八千斤储备粮的决定，明天一早就开仓！

第二天一早，几个干部和群众正准备开仓，小徐腾、腾、腾地跑来，站在他们面前说：“你们想想，你们在干什么？私分粮食，这不是在拆社会主义的墙脚吗？”

“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多吃一点有什么关系？”几个受了蒙蔽的群众说着说着就要动手去打开仓门。小徐勇敢地一脚跨上前去，用身体堵住仓库门，用手护着锁，大声说：“社会主义仓库的门，谁敢乱开！”

人群中几个受蒙蔽的队干部被小徐的行动激怒了，他们气鼓鼓地说：“我们不干了，都让你来干吧！”说罢一甩手就走了，那些吵嚷嚷要分粮的人也就一哄而散。

这时，几个好心肠的社员跑来对徐定月说：“小徐，算了吧，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怎么办？小徐感到这是原则斗争，决不能退却！晚上，她跑到生产队长家里，细心地给他讲了半天社会主义的道理，还告诉他：“在这场斗争中，你这个领头人可要分清路线啊！”

队长有点醒悟了，他问小徐：“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建议召开社员大会，把道理向社员讲清楚！”小徐果断地说。

社员大会开起来了，小徐在会上，从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讲到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从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讲到队里一小撮坏人想多分粮食卖高价的资本主义行为。许多贫下中农听了，当场就说：“小徐说得有道

理！做得完全对！”

几个干部回去想了想，也说：“小徐帮助我们提高了觉悟，做得对！”

两位书记互相补充，讲完了徐定月的故事。副书记小薛又说：“这个队由于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社员积极性提高了，去年粮食增产，收入增加，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分足了六百斤口粮，队里集体留了一万斤储备粮，还多卖给国家一万斤粮食。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也比前一年增加了一角四分。”

说到这里，薛志鹏同志笑着说：“贫下中农培育了徐定月，把她看成是贫下中农的女儿。这次县里把她抽调去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都说：‘这么好的会计，我们真还舍不得让她走呢！’”

“县里把她抽调去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这使我们突然想起了车上遇见的小徐。小徐难道就是徐定月？两位书记听我们讲了她的外貌，齐声说：“就是她嘛！”

小徐啊小徐，原来就是你啊！

两天以后，我们坐上车子离开了宜黄。在这两天中，我们没有机会能再见到徐定月。但是，我们见到了许多和她同样出色地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战斗、成长着的青年同志，他们都各自有一番极生动的事迹，想在这里说也说不完。我们的耳畔不断响起了县乡办老宋同志给我们说过的一句话：“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是完全一致的！”说得真对呵！

在离去的路上，和来的时候一样，车窗外依然是火灿灿、红丹丹的一片，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把天和地都映照得红艳艳的。车子依然在花的海洋、红色的海洋中行进。眼看着这遍地似火的山花，我们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位曾在这地区艰苦转战过的红军烈士的诗句：

“如果我能生存，

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如果我不能生存——死了，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葬骨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我相信，到那时……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我们觉得，千千万万个徐定月，正是烈士们所期望过的一朵朵“可爱的花”。她们扎根在烈士“流血的地方”，承受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的照耀，承受着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春雨甘露，正在三大革命的斗争风暴中茁壮成长，就象这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以她们绚丽的色彩，装点着社会主义祖国“明媚的花园”……

从开始这次访问以来，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绚丽似火的花丛中进行吗？



一 九 七 五 年

第 七 期

总 第 二 十 三 期

XUE XI YU PI D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